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342 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目 录

【论 文】

- 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赵鼎新
- 苏联模式：驾驭民族主义的历史实验 周陆洋
- 美国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发展趋势 周少青
- 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
——对中国与东南亚间国际关系的文化史思考 王赓武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¹

——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赵鼎新²

一、理论

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的富矿，并且产生了许多有很大影响的理论³。以笔者愚见，现存理论多多少少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

第一，缺乏更长时距和宏观的权力 / 结构视角。大多数学者会强调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形态都是近现代的产物，并且认为其产生和发展背后有一些比较单纯的结构性的原因。比如，蒂利提出以民族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欧洲军队打仗更勇敢，战争因此就促进了民族国家在欧洲的扩散（Tilly 1990），盖尔纳认为是工业社会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和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的性质等因素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Gellner 1983），高斯基强调新教组织对其成员的各种“规训”不但为欧洲国家提供了统治模版，并且为民族主义这一跨区域认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Gorski 1993），安德森强调了现代通讯技术在民族主义这个跨区域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意义（Anderson 1991）。本文则强调，虽然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都是近现代的产物，但其思想渊源却可以追述到犹太 / 基督教的一些教义。本文还指出，虽然以上的理论都不无道理，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驱动着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政治模式扩散的原因却有着高度的多样性，很难简约到以上某类理论，但是帝国政治始终在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第二，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学者普遍有给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做出定性的欲望，提出了诸如宗教民族主义（Barker 2009; Brubaker 2011）、族群民族主义（Roshwald 2001; Smith 1981, 1986）、文化民族主义（Bets 2018）、以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Tamir 1995）和公民民族主义（Kohn 1944）等等概念，并试图区分出倾向于和多党民主结合的公民民族主义，和容易引发仇恨、暴力和族群清洗的族群民族主义（Brubaker 1992）。本文则想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内容非常单薄的意识形态，除了认定某类居住在某地、获得了某种地域性政治认同的群体（民族）拥有自治权之外，再无其它。但这一特点却给了民族主义思潮很大的生命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结合而形成高度多样的变种。简单地通过给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定性来把握其性质，非常容易让我们忽视这一点。为了缓解这一困境，本文通过对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梳理总结出了四个在经验层面影响巨大的理想型——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讨论了这些理想型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出哪类理想型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帝国政治框架下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

第三，以往学者会强调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是捍卫文化多样性的武器（Hobsbawm and Ranger 1983）。本文则指出，民族主义运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精英操纵下的产物，并且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也是地方文化多样性的杀手。

第四，以往学者或者会认为民族想象必须要有族群、文化或者语言等客观基础才能维持和壮大（Hroch 1985; Smith 1983），或者会强调民族是一个“想象共同体”（Anderson 1991）。本文

¹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21年12月号，第188期，第3-21页。

²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³ 本文是对笔者正在进行的有关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形态在全球占据主导背后成因研究的一个纲要性总结，目的旨在抛出笔者在研究中初步形成的一些观点，而不是给出系统性的论证。

指出，民族认同既可以植根于某种客观的历史、宗教或文化基础，也可以建立在纯粹的想象和制造的基础上，并且民族主义运动的认同基础在世界上有一个从客观到主观的发展过程。

下文对本文提出的理论与威默尔（Andreas Wimmer）和豪（John A. Hall）两位研究民族主义运动专家的理论的相似和区别做出讲解，由此来点明本文理论的一些要点。威默尔的理论可称之为“权力-合法性”解释框架（Wimmer 2013, 2018; Wimmer and Feinstein 2010; Wimmer and Min 2006），而本文的理论则可以称之为一个“帝国政治-意识形态”解释框架，由于两者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以阐释。威默尔的理论大致可以总结如下：近代欧洲国家力量不断增强，插手社会的能力也不断加大。在此过程中，欧洲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不断冲撞，最后实现了国家合法性基础的转变。具体而言，国家需要为国民提供公共物品并且给予国民政治参与的权力，而国民则为国家提供税收和军事支持。因为率先实现这一合法性基础转变的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要比帝国以及其它政体形式的国家来得更为强大，这就导致了同构扩散（即其他国家开始仿效），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因此逐渐取得主导（Wimmer and Min 2006）。

威默尔认同如下一些被广为认可的观点，即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是一个帝国垮台的过程（Jászi 1929; Roshwald 2001; Shaw and Shaw 1977），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具有某种内禀的同构扩散动力（Meyer, Boli, Thomas, and Ramirez 1997），以及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威默尔同时也强调不同国家间的军事竞争对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让我们看到蒂利（Tilly 1990）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面，虽然蒂利分析的只是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和扩散，而威默尔却把蒂利的逻辑推广到了整个世界。

笔者对威默尔的理论有四点质疑：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法这两个民族主义思潮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其统治者的疆域控制、自我认同、行为方式都更像是帝国，而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族国家。第二，至少到二战前，传统的帝国政治一直占据着主导，决定世界政治格局的也同样是帝国之间的政治。与其说是因为民族国家战争能力强导致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在世界上取得主导，不如说是帝国的扩张以及帝国之间的战争不断给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机会。第三，大多数国家得以独立并且发展成为民族国家，并不主要是因为那些国家内部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而是得益于帝国冲突而造成的非企及结果。第四，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都有广泛的民众加入，但是民众往往是被动员起来的，而不是因为有了民族意识后才自觉加入。民族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个政治精英运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以国家或者其他政治精英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运动，而不是一场在民众与国家讨价还价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运动。

在众多的民族主义理论中，笔者的理论与豪的“帝国政治”解释框架最为相似（Amasyali and Hall 2021; Hall 1993）。豪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高度多样性，决定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是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帝国垮台、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对于这些观点，笔者都特别认同。但笔者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与豪有三方面的区别。第一，虽然民族主义是个现代现象，但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却有前现代渊源，并且这个渊源并不是来自通常所认为的近代族群意识和国家能力的发展（Armstrong 2017; Wimmer 2013），而是来自犹太 / 基督宗教的零和性。换句话说，民族主义不但是现代产物，而且还是西方文化下的产物。比如，族群意识和国家能力在宋朝及以后的中国日益发展，但如果没有西方给中国送来了民族主义，笔者很难想象在东亚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秩序中会自然发展出民族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第二，笔者更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和生命力的意识形态来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内容单薄而有着机会主义的特性，或者说它不但能和任何性质的社会政治结构结合，而且非常容易与影响力正在上升的任何性质的意识形态结合从而产生大量变种。启蒙运动后产生的任何世俗意识形态都有过时的可能，唯独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很难落伍。第三，笔者认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主导因素是政治，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帝国垮台到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但是相比于豪，笔者更强调世界范围内的帝国政治在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世界近代史中，帝国的性质和行为方式不断变化，

但其主导性始终没变。

笔者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二战后民族国家这一国家模式在全世界取得主导的解释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近代以来的帝国政治和既定时空下主导意识形态的结合，不但决定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而且还决定了不同时空下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这个理论有两个相互依存的要点：第一，民族是一种认同，除了家庭和其他一些在直接交往基础上产生的认同，其它形式认同的建立都得靠某种外在强制力，而不是仅仅靠共同语言和文化等客观基础。第二，在所有的外在强制力中，国际政治，特别是大帝国之间的政治是最强有力并且最具后果性的力量。

因此，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都应该首先从帝国政治出发来做考察，而不应该仅仅从诸如族群认同、历史记忆、对于民族自觉的追求、通讯和交流手段的提高、民族国家模式的扩散能力等强制力较弱的社会力量出发来建立各种“瞎子摸象”式的理论。这里并不是说后面这些因素不重要，而是这些因素本身的重要性，或者说它们对于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型塑作用，都首先受到帝国政治的影响。在本文中，“帝国”指的是一类地域庞大、内部文化和族群多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有一定主导权，并且对其他国家的主权有显著的干涉意愿和能力的一类政体模式，而不是狭义的专指近代西方侵略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也是目前国际学界的一个通行用法。在国家建构史上，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已经延续长达数千年，发展出多种类型，至今历久不衰。

二、民族主义发展的九个阶段

基于本文提出的“帝国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框架，笔者把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分成九个阶段，即九个历史转折点。以下是九个阶段基本特征的一个简要总结。这个总结欲达成三个目的：其一是点明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犹太/基督教的关系；其二是阐述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如何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和发展，从而改变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迎来了二战后民族国家模式的主导，以及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其三是勾勒出一些重要、但在别的理论框架下容易被忽略的经验事实。

（一）犹太/基督教的零和性和人类认同感的突破性发展

犹太教出现之前的世界是多神教的天下。彼时的征服活动通常伴随着“胜者所推崇的神为大”这个规律。因此，随着某些政治势力的兴盛，某些神的影响也逐渐强大，但这一发展并不改变多神教世界的基本宗教生态。从许多方面来说，犹太教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具有转折点意义。在犹太教取得主宰之前，由多个部落（传统说法是十二个）组成的犹太人活动于迦南、埃及一带，遵循着多神教的传统，与近东地区的其他部落和部落联盟并无本质不同。就犹太人的命运来说，成了“上帝的选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它帮助犹太人确立了一个跨部落的认同，加强了内部的凝聚力，发展成了一个在前现代就有了“民族”（nation）概念的群体。但问题也在于此，它将犹太人与其它群体之间的边界清晰化。不难想象，在前现代的政治文化氛围下，一个内在凝聚力强大、外在边际清晰的群体势必会引来其他政治势力的挤压，而这种挤压在缩小犹太人生存空间的同时，势必会加强犹太人的民族认同。

必须说明，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犹太教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它们在思想上却有高度的同构性。笔者很难想象，在一个多神教的世界中会出现认同清晰、边际清楚的民族主义思潮。犹太教的兴起可以说是为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发展播下了一颗种子，但这颗种子将以基督教的形式得以保存。

对于本文来说，基督教的意义在于它在罗马帝国框架下把零和性的犹太教改造成为一个兼具零和扩张性的宗教（零和指的是一种“只有我掌握着真理，其他都是谬误”的思维方式，扩张指的是基督教徒在非犹太人中的传教动力）（Sun 2017, 2019）。获得了对外传教动力的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教派（sects）发展成一个新兴宗教，并且在康斯坦丁大帝（Comstantine I. 306-337 CE）归信基督教后有了较快的发展。如果说犹太教是一个具有“民族”性的宗教，那么基督教则是一

个具有帝国性的宗教，但基督教仍然在一个帝国 / 文明的规模下保留了犹太教的零和特性。

(二) 基督教的“民族”化与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的诞生

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欧洲的历史。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基督教给了人类冲突一个特殊的表达：正因为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扩张性，中世纪欧洲才会上演以传播基督教为重要目的的对“蛮族”的征服活动（Barbero 2004；Fletcher 1998），有针对非基督教国家的十字军东征和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Christiansen 1997；Harvey 2005；Riley-Smith 1999，Smith 2010），有对各种“异端”基督教派（heresies）的血腥镇压（Keickhefer 1979；Peggy 2001），有充满激情的对外传教（mission）活动，等等。这些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在政治纷争的欧洲维持了天主教世界（Catholic ecumene），直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

对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分析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与本文有关的是，该运动所引发的延续一百多年的宗教冲突撕裂了基督教世界，导致了大多数欧洲国家卷入宗教战争，并最终通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所谓的“教随国立”原则。对于民族国家的兴起来说，这一阶段的发展因为两个关联的原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宗教改革运动中各新教教派都加大了对其成员的宗教参与和道德规范要求，同时也加强了教会的社会功能。高斯基把加尔文教派国家中出现的类似发展称之为“规训革命”（disciplinary revolution），并认为这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Gorski 1993）。高斯基没告诉我们的是，对信众规训的加强是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常态，并不限于加尔文教派。比如，面对新教咄咄逼人的发展，天主教也进行了包括了反对腐败、发展学校和修会、向海外传教、镇压天主教国家内部“异端”等方面的反宗教改革运动（the Counter-Reformation）（Luebke 1999）。这些发展对于天主教国家同样也有巨大的文化整合作用。

第二，更重要的是，宗教冲突给了国家能力趋强的英法等国通过确立国教、打击异端来进一步加强国家权力提供了良机。西方学者把英法两国出现的民族主义称为“公民民族主义”，并认为此类民族主义不会导致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等现象。其实，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和被迫移民，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屠杀发生的时间点不同。1557年后，遵奉天主教的法国统治者与信奉加尔文教派的雨格诺派（Huguenots）发生了长达多年的冲突和战争，造成了“族群”清洗式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以及大规模的被迫移民（Treasure 2013）。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确立英国国教圣公宗（Anglican Church）后，英国也发生了长达一百多年以宗教争端为核心的冲突，包括十七世纪中叶的内战（English Civil War），以及随后由天主教国王和新教议会之间的斗争而引发的“光荣革命”。整个过程同样也造成了大规模的杀戮和被迫移民（Brian 1973；Tyacke 1998）。笔者认为，英法两国强行推行“国教”或者“国教派”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波大规模“族群”清洗。正是由于这些血腥事件，英法两国核心地区的文化认同在民族主义思潮出现前就有较高的整合，为族群意识不强的公民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比较而言，同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区由于原本族群/宗教构成比较复杂，再加上国家分裂，国家力量普遍较弱等原因，没有出现英法两国同等规模和同等普遍程度的前现代“族群”清洗，因此直到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在德国形成之时，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在外族（拿破仑）侵略的压力，德国于是就出现了通过族群而不是公民认同来定义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此后在德国和世界各地出现的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可以说是不幸补上了在英法等国早已完成的一课。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把犹太教理解为一个民族性的宗教，那么基督教就是帝国性的宗教，宗教冲突对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则是把欧洲世界的基督教“民族”化了。笔者还想强调的是，彼时由宗教冲突而引发的国家建构仅仅为民族主义运动在后世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如果没有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美法革命），欧洲的国家建构进程很可能会像宋朝以后的中国一样，长期停留在蒂利（Tilly 1990）称之为“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阶段，即一种由官僚统治、政治精英有较高文化认同，但是普通民众缺乏民族意识的国家形式。因此，要了解当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我们必须从美法革命开始谈起。

（三）七年战争和美法革命

如果说犹太/基督宗教的零和性给当代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思维和组织方式层面的基础，那么此基础直到18世纪后期的美法革命期间才有了“民族主义”这一新的历史意义，而这一意义却是通过帝国争霸而导致的七年战争（1756-1763），而不是“民众”的诉求，才得以充分表达。此后，民族主义的犹太/基督教的源起隐藏到背后，而帝国政治则成了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兴起和发展更为直接的动力。

七年战争以英国、普鲁士联盟为一方，法国、奥地利、俄国联盟为另一方，是一场由英法主导的欧洲帝国在欧洲本部和殖民地的争霸战。对于民族主义运动来说，七年战争的意义是美法革命的导火索。虽然英国在战争中占据上风，获得许多新殖民地，但却陷入了财政危机，而在北美殖民地征税就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直接起因。法国同样因为与英国多年的战争，包括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军事支持，陷入了严重财政危机，而法国革命就起始于路易十六为了增税而召开的三级会议（The Estates-General）。

民族主义是美法革命的共同诉求，或者说美法革命标志着民族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此时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仅仅局限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即使在这些国家，民族意识也不能深入稍微偏远的地区。在此阶段，自由主义是世界上唯一成型的世俗意识形态，而且是美法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自然就正处于强势的自由主义达成了结合，形成了公民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第一种误解，即民族主义有民主意义，是“公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方式，因而寄予厚望。

（四）拿破仑战争、民族主义的扩散和族群民族主义的形成

美法革命后，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其它地区开始涌动，但这仅仅局限在小部分精英群体。就算对于这些人来说，民族主义也是全新的概念，与传统的出于对自己所熟悉文化自发产生的情感并不容易分开。此外，对于这些精英来说，民族也不是他们主要的政治认同。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拿破仑大军屡破奥德军队后，作为日耳曼人的贝多芬会为拿破仑写《英雄变奏曲》，为什么同样是日耳曼人的黑格尔会在拿破仑率法国军队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军队后把拿破仑誉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Hegel 2018）。贝多芬和黑格尔的态度在启蒙运动时代的知识群体中有代表性，因为他们都没有只把法国革命看作是一场法兰西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对法国革命的理念寄予厚望，渴望能生活在以这些理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中。当然，他们的希望马上就会破灭。

拿破仑的军事征服是典型的帝国行为，但这一行动却把原本主要局限于英、美、法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扩散到欧洲大部分地区。此外，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同时期的拉丁美洲也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并且产生了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 b. 1783-1830）这样的具有传奇性的人物，虽然拉美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于民族主义在旧大陆的扩散并没有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欧洲各国之所以都开始提倡民族主义，一种通常的理解是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起来的民众打仗更有战斗力（Tilly 1990; Wimmer 2013）。这并非没道理，但这里要强调两个更为直接也更重要的因素。第一，法国革命的核心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欧洲大陆启蒙知识分子和启蒙君主（enlightened princes）的共识，这才使得革命中迸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各国被争相效仿。第二，在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产生的“民族国家”严格来说都应该被称之为是“帝国民族国家”（imperial nation states），即对内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对外进行帝国扩张的国家。这些国度中统治者的思维和行动都高度混乱，以至于在侵略他国的同时却会打着帮助他国“民族解放”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的背后除了各种现实考虑外，甚至还有一丝真诚，因为这类统治者的思维和行动逻辑本身就是集帝国和民族国家于一身。就这样，帝国扩张和帝国冲突反而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让人因果倒置地以为民族主义运动本身是帝国的坟墓。实际情况却是，法国革命后民族主义运动的每一步发展背后的最主要推手都是帝国扩张和冲突，并且强大的“民族国家”多少都会萌生帝国倾向。

中东欧地区的族群和宗教信仰构成要比英法地区复杂得多。在文化高度多样的土地上建构具

有同质性的“民族”，该地区知识分子就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以共同语言、文化和宗教等依据为基础的族群民族主义（Smith 1986）。族群民族主义坚持保护和弘扬自身文化，甚至往往会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打着捍卫地方文化的旗帜。但真实的历史过程却往往是：为了在一个高度多样和地方化的文化和认同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想象，各国精英都对内部不同文化施行了“清洗”。而且，一个国家建构同一想象的基础越差，其文化清洗的力度也往往越大。在一般情况下，民族主义有助于现代国家确立统一的语言、历史想象和教育体系，这对文化多样性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族群民族主义所表现出的排外和族群清洗倾向，使得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第二个误解，即认为公民民族主义带来的是自由和宽容，而族群民族主义带来的往往是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这观点至少有两个误区。首先，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确立了公民民族主义的英法两国在天主教和新教冲突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了族群和文化清洗。其次，公民民族主义的确为一个国家内部各种文化人群的共存提供了基础。但是相比于族群民族主义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意识形态，公民民族主义则是一个地域性不强、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共和”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公民民族主义的弱地域、强价值观的特性暗含着一种扩张性的“帝国”性质。在经验层面，这一帝国性通过三个方面得以呈现：

其一，推崇公民民族主义的国家侵略成本较低，因为这套地域性隐藏在意识形态后边的语言比较容易获得被侵略国家中价值观相近人士的同情甚至支持。前面提到的贝多芬和黑格尔对拿破仑帝国扩张的庆祝和赞赏仅仅是两个例子，在此后自由主义名义下的帝国扩张中，类似例子比比皆是。其二，一旦公民民族主义背后的一套自由民主话语成为主流价值观，甚至被认为是历史使然时，掌握着这套话语体系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精英就容易会把其他类型的国家都看低一等，从而在各种堂皇的理由下侵略它国或者干涉它国内政。这就是为什么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极力支持英帝国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扩张（Pitts 2009），为什么苏联垮台后的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也特别热衷于输出民主、干涉它国内政等帝国行径。其三，公民民族主义弱地域、强价值观的特性容易让一些有独立野心，但又缺乏血缘、语言、宗教、历史等地域/族群基础的政治精英，声称自己所掌控着的群体是一个在同一价值观下的“想象共同体”。一般来说，一个群体在建构“民族”时的地域/族群基础越弱，有独立野心的精英就越可能会在寻求独立时在群体内强行制造认同而对外则寻求价值观相近的大帝国的支持，从而沦为该帝国的棋子，或者说间接成就了大帝国的帝国行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需要强调，任何政体类型的国家一旦强大起来，都多多少少会呈现帝国景象，这一点并不是以公民民族主义立国的国家所特有，但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弱地域、强价值观的特性确实给帝国扩张提供更多便利。

（五）帝国的全球性扩张/冲突和民族主义在欧亚大陆的蔓延

如果说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时代仍然主要是欧洲现象，此后它则开始向北非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扩散。扩散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帝国政治，特别是近代欧洲帝国在全球更大范围内的殖民和争霸，以及在这些帝国的挤压下传统帝国的衰弱和垮台。例如，奥斯曼帝国的不断衰弱，特别是第七次俄土战争（1806-1812）的失败，引发了塞尔维亚和希腊独立战争（Aksan 2013）。英俄两国围绕着对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争夺而进行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削弱了包括奥斯曼、波斯、阿富汗酋长国等传统帝国的势力（Hopkirk 1990），乃至清政府对西藏和新疆两地的控制减弱，为民族主义在整个地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此阶段后期，日本也加入了帝国扩张的行列，并且在甲午海战中摧毁了北洋水师，其结果是激发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对此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笔者想做四点说明。第一，民族主义这一在西方世界出现的现象在欧亚大陆的扩散过程中变得日益复杂，很难用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这两个理想型来概括。宗教民族主义在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地区正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但在西方强大的军事和文化压力下，彼时的宗教民族主义往往会与一些旨在学习甚至是赶超西方的支持改革的宗教教义结合，其宗教性的一面容易被忽略。第二，西方帝国的侵略和帝国之间的冲突刺激了非西方

国家民族主义产生，但是西方同时也是民族主义人才的培养地和书写非西方国家“民族史”的思想武器库。比如甘地就是在英国学习阶段才深切感受自己作为英帝国二等公民的境遇，从而开始他为印度独立而奋斗的生涯。中国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如梁启超和章炳麟）的思想也是在日本期间才走向成熟。因此，虽然各国第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思想都带着自己文化的特色，他们同时也深受当时西方盛行的各种思潮的影响。“进步-落后”分明的线性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等西方思潮，不但在日本的福泽谕吉、印度的甘地和中国的梁启超和章炳麟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历史的书写方式。第三，族群清洗和强制性移民现象在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发展为常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第四，虽然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阶段已经渗入到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大多数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在西方殖民地中其实没产生很大影响（Amasyali and Hall 2021）。即使是在发生了辛亥革命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直到抗战前也未能渗入到农村（Israel 1966; Johnson 1962）。

（六）一战、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被一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枪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其背后更大的动因则是欧洲各帝国在殖民地等问题上的长期冲突。一战导致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英法帝国的衰败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帝国的垮台”这么一个印象（Jászi 1929; Roshwald 2001; Shaw and Shaw 1977），但一战后主宰着世界政治的仍然是帝国。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提出了有利于弱小民族自决的“十四条”，但会议最终发展成一个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战胜国的分赃会（Neiberg 2017）。此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再次见证了帝国政治的主导性：二战前德国侵占了奥地利和捷克，并和苏联瓜分了波兰；日本占领中国的东三省；美国在古巴、海地、尼加拉瓜等南美国家驻军（Langley 1983）；连军事能力有限的意大利也在希腊、巴尔干和其它地区进行扩张（Burgwyn 1997）。此外，国家统治者或其它精英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也在不断加强，但就影响力来说，即使是在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中国，其影响仍主要局限在知识群体、工商业者和部分城市市民。此时非西方国家中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但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而且也不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最后想指出的是，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走向保守，法西斯主义盛行一时，当然也受到许多国家民族主义者的青睐。

就更长远的历史后果来看，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生却是这阶段的亮点。1917年十月革命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工人没选举权，缺乏福利保障体制，同时当时的国家对经济也都缺乏调控能力。因此，工人不但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并且直接承受着资本主义市场下经济波动的压力。在此大背景下，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各国取得了很大影响，并在俄国获得成功。

共产主义者认为，工人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强的超越民族的利益和认同感，民族主义因此会在历史中逐渐消亡。这一设想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以下三个原因决定了民族认同相比于阶级认同具有更坚实的基础：第一，民族认同能建构在语言、宗教、地域、血缘、族群等比较扎实的基础之上，而阶级认同的唯一基础就是经济地位，但工人之间收入差异却很大。第二，阶级认同是反抗者的武器，它吸引的主要是社会下层和青年理想主义者。相反，民族认同不但能吸引社会各阶层，甚至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国家统治者又或有独立意愿的精英群体也很有兴趣和野心来构造民族认同。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一个上下都有“帮手”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不是。第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单薄的内涵决定了它是一个广谱意识形态，即它很容易与影响正在上升的其它意识形态结合并产生各种变种；相反，共产主义则是一个对“真理”有独特理解的窄谱意识形态，因此很难逃脱以下两个限制条件：要么很难和其它意识形态做很好的结合，要么结合得很好而失去自己的主导性。当然，对于民族主义的这些性质，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十分了解。

十月革命前，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在俄国少数族裔地区蔓延。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沙俄少数族裔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在俄帝国的版图下建立超越民族的苏维埃是一个更为进步的选择。因此，

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中沙俄少数族裔青年占有很大比例 (Riga 2012), 并且沙俄的疆域也以“苏维埃民族国家联盟”(Universal Union of Soviet Republics) 的形式得以保存。此时, 虽然民族主义已发展出多种形态, 但其主流并没超出公民/族群民族主义两个理想型的范围。十月革命后民族主义出现了第三个理想型, 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具体来说, 苏维埃革命的成功使得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成了许多国家民族主义者的一个选项。这就是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名言的历史背景。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注定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结合, 而两者之间的张力肯定会体现在苏联的民族政策和国际政治方针中。共产主义者认为经济和政治平等有助于压抑民族意识。因此, 苏联注重各民族的经济和政治平等, 而相对忽视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对于民族意识的重要性。为了帮助少数民族获得平等, 苏联花了很大努力, 成了名副其实的“平权帝国”(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Martin 2001), 到头来不但造成了俄罗斯人的不满, 还给少数族裔的独立提供了多种资源。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公民民族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 它们都不强调族群和地域, 因此也都伴有“帝国”的一面。苏联“输出革命”, 在华沙条约国内部搞“有限主权论”, 要求各国共产党不惜损伤本国利益对苏联做各种支持, 这些都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帝国性的具体体现。苏联垮台的背后有许多原因, 其中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确起了很大作用 (Suny 1993)。但话说回来, 在一战到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 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对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殖民和半殖民地中, 共产党组织在十月革命后相继涌现。

(七) 二战、美苏争霸和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

二战结束后, 近代兴起的西方帝国相继垮台, 殖民地独立成了世界潮流, 世界迎来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 但这整个过程却仍然是在帝国政治的主导下才得以完成。简言之, 帝国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二战, 二战期间各帝国的行为既促进了殖民地的民族意识, 也为它们的独立提供了资源。此外, 由于美苏这两个在二战后涌现的超级大国都支持民族自决, 大量国家才能比较顺利地获得独立。同样重要的是, 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帝国政治成了历史, 只是帝国的性质有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 以长期军事占领和建立殖民政府为手段的“正式帝国”(formal empire) 在二战后变得过时, 取而代之的是美苏这两个主要通过扶植利益或价值观相近的代理人, 以经济和意识形态手段, 辅以军事威慑和手术性的军事打击来进行对他国控制的“间接帝国”(informal empire) (Black 2015; Mann 2003)。

二战期间及此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几个新的发展趋势需要强调。第一, 日本帝国在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中有着三方面的重要作用: 它的“成功”(即在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发展) 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模版; 它的侵略刺激了被侵略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 最后, 日本在侵略时打着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亚洲诸国,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口号, 其结果就是在东南亚一带传播了民族主义, 与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起到同样的效果。

第二, 二战后涌现了大量新型国家。这些国家所在地区的全部或者大部在前现代处于采集社会和小型部落社会, 它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个国家, 完全是因为殖民地的政治遗产。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民族国家, 主观打造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民族是“想象共同体”这样的理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个误解, 因为决定一个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想象方式和最终命运的始终都是帝国政治, 而不是印刷资本主义。

第三, 这一阶段新独立国家内部出现了大量分裂运动、族群冲突和清洗。背后的原因很多, 有些是美苏争霸所致, 有些是殖民地行政区划和管理方式留下的负面遗产, 有些是殖民帝国撤离时有意无意种下的祸根, 有些则是前殖民地母国制造事端、保持影响力的手段。民族主义曾经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对抗西方列强的武器, 现在却和大国操控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四, 二战后共产主义国家从苏联一个国家发展成为东方集团 (the Eastern Block)。中国共产党取得江山后, 共产主义国家所控制的人口达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势

头，再加上新独立国家原来的殖民者都是西方列强，使得该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会与势头正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并且采取了反西方的姿态。周恩来把这一潮流总结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左派知识分子由此产生了一个误解，即认为反殖民和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本源性质。

（八）美国独霸和“自由”民族主义的回归

自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西方曝光后，苏联的软实力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逐渐减弱。在勃列日涅夫任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十八年（1964-1982）里，美苏两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不断加大。加上中苏关系破裂后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美国所害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并没有出现等因素，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外交政策在1970年代中期有一个重大转变。此前，美国的目标是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其策略包括在国内推动麦卡锡主义，在国际上支持右派专制政权、刺杀民选左派政府首脑、武装训练敌对国反对力量，乃至直接军事干涉；此后，美国则开始推广民主、发展人权外交。美国战略目标的改变和苏联的衰弱乃至解体给20世纪末的世界带来了巨变。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把这一巨变称之为“第三波民主浪潮”（Huntington 1993）。

第三波民主浪潮开始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信心暴涨的美国人不断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苏联强势之时到处“输出革命”，而美国则热衷于搞人权外交、军事干涉和“输出民主”。美国的行为使得整个世界出现了一个虚假的同构扩散现象，即性质完全不同的反对派和谋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为了获得美国在金钱、物质、武器和道义上的支持，都打起“民主自由”的旗号。自由民族主义曾经是美法革命的旗帜，但在拿破仑时代过去后，始终没有在世界上占据上风。而“自由”民族主义的回归给了知识分子普遍的幻觉，认为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时代即将到来。对这一观点最著名的表达就是政治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Fukuyama 1992）。但他们马上会失望。这里给“民主自由”和自由民族主义中的“自由”都打上引号，是因为这些口号下混杂着不少原本与“自由民主”完全无关的政治势力。

（九）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化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

在1980-90年代，“自由”民族主义在世界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但它迅速退潮的原因却是显见的。成功的自由民主需要有一个宽容的文化，但是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这种文化；成功的自由民主需要不同政党之间有着比较接近的意识形态，但是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中政党意识形态高度对立；成功的自由民主还需要健全的公民社会，但是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往往由部落、黑社会、大公司、地方强人和保守宗教组织把持。因此，除了少数国家外，民主转型在大多数国家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衰退、社会保障体系崩溃和低质民主，而且还有分裂主义运动、领土纠纷和由此引起的大规模仇杀和族群清洗（Bunce, McFaul, and Stoner-Weiss 2010; Melvin 2005; King 2009; Brownlee 2007; Hadiz 2010; Schedler 2006）。

本文已屡次指出，民族主义因为缺乏深刻内涵而从来没有产生过自己的思想家，所以和时下的强势意识形态接合才能产生力量。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强势的时候都曾经受到民族主义青睐。可以说，一个时代民族主义的性质所反映的其实就是该时代的风貌。当今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呈四个特征，折射了世界的大格局：

第一，自产生之日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在总体上趋于多样，但在既定时空中，某一类民族主义思潮往往会占据上风，反映了当时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和帝国政治的格局。但今天世界各种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莫衷一是，体现了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和世界开始失去主流意识形态。

第二，虽然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性质高度多样，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度、土耳其、伊朗、中东以及其他许多地区越来越占据上风，并且这一波运动与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宗教民族主义并不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但是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在今天世界的许多地区却占据着绝对主导。其次，19世纪比较有影响的宗教民族主义一般都会选

择拥抱现代化改革的宗教教义，体现了启蒙思想和理性精神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而当今世界的宗教民族主义往往会选择保守、反现代化、甚至是反理性的原教旨宗教教义，说明人类正在经历启蒙运动后最严重的思想危机。

第三，“自由”民族主义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呈现了很大的理想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倾向，目前世界不少地区的“自由”民族主义却开始呈现出各种保守倾向。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为例，虽然该运动打起的是“自由民主”旗号，却出现了持续性的大规模骚乱和暴力，特别是对有大陆背景人士的“族群”歧视，显露出了严重的偏执、保守和不容忍精神。这种发展趋势说明了任何意识形态在走下坡的时候都会呈现保守的一面，自由主义也不能幸免。

第四，在中美、俄美战略碰撞的前沿，美国主导下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余威仍在，具体体现为各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在这些地区仍是主流势力。乌克兰民选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其领导下的乌克兰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缓慢，政府效能低下，民族主义情绪却十分高涨。这类民族主义在中俄周边地区的大量存在，表明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俄目前也拿不出像1950、60年代的共产主义一样能与美国对抗的价值体系。

三、总结

本文划分了民族主义运动在近代形成和发展的九个最为关键的历史阶段，分析了各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原因，并且对为什么二战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态会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本文提出“帝国政治-意识形态”，还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作出了分析，并且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其中有些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共识，有些则是作者的观点。

第一，虽然民族主义运动是当代的产物，其渊源却可以追溯到犹太/基督教的一些重要元素，以及在基督教笼罩下前现代欧洲的政治发展。可以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但是西方世界的产物，而且犹太/基督教的线形史观以及零和、扩张特征，仍然型塑着当代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一些根本性的特征。

第二，民族主义不但不是保护地方文化的法宝，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地方多样性文化的杀手。因此，强调保护地方文化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并没有当然的正当性。

第三，民族主义运动不是帝国的坟墓。反之，帝国政治却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最重要的推手。

第四，民族主义运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国家统治者或精英群体所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命运的也主要是帝国政治，而不是某地区的精英欲望或者“人民”意愿。

第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内涵单薄。这一性质却给了民族主义一个其它意识形态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它能与任何性质的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并产生比起所结合的意识形态更具有生命力的变种。任何意识形态都会过时，唯独民族主义一旦产生就很难落伍。

第六，在当今社会，一旦一个群体有了独立欲望，即使没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历史作为想象基础，他们也能声称自己是“想象共同体”，用当前世界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给自己的诉求进行道德包装，强行制造认同感。民族主义在当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无中生有地进行建构的意识形态。

第七，虽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类型高度多样，但它一般不会超出四个理想型的范围：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都是族群/地域性较弱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都很容易产生帝国倾向。族群民族主义有很强的

地域性，虽然帝国倾向较弱，但却有很强的触发族群清洗。宗教民族主义的性质比较复杂，要看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宗教教义的性质而定。这儿的关键是零和性和扩张性这两个衡量准则（Sun 2017）。一个宗教的教义越具零和性，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越会发展出族群/文化清洗倾向；一个宗教的教义越具扩张性，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越可能发展出帝国倾向；而对于一个同时具有很大的零和性及扩张性的宗教来说，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会有兼具两种倾向。当然，以上总结的是理想类型下的因果关系，事实要复杂得多。

参考文献：

- Aksan, Virginia. 2013.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New York: Routledge.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 Armstrong, John A. 2017. *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Barbero, Alessandro 2004. *Charlemagne: Father of a Contin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rker, Philip W. 2009. *Religious Nationalism in Moder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 Betts, Gordon G. 2018. *The Twilight of Britain: Cultural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ol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Black, Jeremy. 2015. *The British Empire: A History and a Debate*. Farnham, UK: Ashgate.
- Brian, Manning. 1973.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Brubaker, Rogers.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2011.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Four Approach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8 (1): 2-20.
- Burgwyn, James H. 1997.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1918-1940*. Westport, Conn.: Praeger.
- Christiansen, Eric. 1997. *The Northern Crusades*. London: Penguin Books.
- Dunn, Susan. 1999. *Sister Revolutions: French Lightning, American Light*. New York: Faber and Faber Inc.
- Fletcher, Richard A. 1998. *The Barbarian Conversion: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 New York: H Holt & Co.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orski, Philip S. 1993. "The Protestant Ethic Revisited: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Holland and Pruss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2): 265-316.
- Harvey, Leonard P. 2005. *Muslims in Spain, 1500-161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2018.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kirk, Peter. 1990.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 Hroch, Miroslav. 1985.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Israel, John. 1966.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ászi, Oszkar. 1929.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A.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ickhefer, Richard. 1979. *Repression of Heresies in Medieval German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Kohn, Hans. 1944.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Macmillan Co.
- Langley, Lester D. 1983. *The Banana Wars: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the Caribbean*.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Luebke, David M. 1999.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ss.: Blackwell.
- Mann, Michael. 2003.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Verso.
- Martin, Terry. 200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 144–81.
- Neiberg, Michael S. 2017.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Concise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gg, Mark. 2001. *The Corruption of Angels: The Great Inquisition of 1245-12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itts, Jennifer. 2009.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iga, Liliana. 2012. *The Bolsheviks and the Russian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ley-Smith, Jonathan. 1999.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hwald, Aviel. 2001. *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Empires: Central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Russia, 1914-1923*. New York: Routledge.
- Shaw, Stanford J., and Ezel Kural, Shaw. 1977.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2: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81. *The Ethnic Revival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3.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NY: Holmes & Meier.
- .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Smith, Damian J. 2010. *Crusade, heresy, and inquisition in the lands of the Crown of Aragon (c. 1167-1276)*. Leiden: Brill.
- Sun, Yanfei. 2017.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Post-Mao China: State and Relig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2 (6): 1664-1725.
- , 2019. “Reversal of fortune: growth trajectories of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in moder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48: 267–298.
- Suny, Ronald G. 1993.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mir, Yael. 1995.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Tilly, Charle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Blackwell.

- Treasure, Geoffrey R. 2013. *The Hugueno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yacke, Nicholas, ed. 1998. *England's Long Reformation: 1500-1800*. London: UCL Press.
- Wimmer, Andreas 2013.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18. *Nation-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and Others Fall Ap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mmer, Andreas and Brian Min. 2006.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Explaining wars in the Modern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6): 867-897.
- Wimmer, Andreas and Feinstein, Yuval 2010.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5): 764–90.

【论 文】

苏联模式：驾驭民族主义的历史实验¹

周陆洋²

苏联民族模式在世界历史占据重要地位，是传统帝国秩序面对民族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冲击的回应。苏联建立的背景是世界性的帝国危机。由于工业革命、世俗化祛魅、君主制危机、民族主义崛起等因素，帝国作为一种政治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挑战。各大传统帝国都在寻求应对平衡策略，既要积极回应殖民地精英的民族主义诉求，又要尽可能保持疆域统一。由此衍生的帝国保存方式多种多样，并大体分为三种路径，一种是“民族化帝国”，以原先的核心族群为基础，或拓展其概念、或发明“帝国民族”（imperial nation），把帝国整合为类似单一民族国家的新单位，例如法国³。另一种是“联邦化”，允许殖民地以多种形式自治、自决，同时通过邦联、贸易协定等方式留在原宗主国范围内，规避硬脱钩造成的经济社会混乱⁴；特定形势下，原帝国的核心与边陲甚至可以组成较为平等的姊妹联合体，如奥匈帝国和葡萄牙-巴西二元王国⁵；第三种方案则是基本保留帝国结构，从种族和生物观念区隔于其他族群的核心民族，以此确保对边陲的绝对控制，比如德意志帝国⁶。苏联模式借鉴了上述三种模式的元素，但不同于任何一种，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后殖民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具有独特的世界历史意义。

苏联民族模式具有几个关键要素：一、族群民族化：将原先沙俄帝国境内的族群识别或重新建构为民族，由苏维埃国家为其发展特定的民族语言，定义民族风俗和文化艺术；二、领土化：为各个民族划定领土，包括把原先散居在各地的被划为同一民族的人迁入一地集中居住，并建立自治单位，这些自治单位既可以是加盟共和国，也可以是加盟共和国下属的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三、本地化：民族区域重点培养和任用本民族干部，通过强调其民族身份推行国家政策；

¹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21年12月号，第188期，第22-37页。

²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³ Berger, Stefan, and Alexei Miller (Eds.). 2014. *Nationalizing Empires*. Budapest;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Darwin, John. 2013. "Empire and ethnicity." Pp. 147-71 in *Nationalism and War*, edited by Siniša Malešević and John A. Hall.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⁴ Betts, Raymond F. 2004. *Decoloniz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Good, Mary-Jo DelVecchio (Ed.). 2008. *Postcolonial Disord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gden, Anthony. 1995. *Lords of All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 1500-c. 180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⁵ Fieldhouse, David Kenneth. 1966.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⁶ KOLSTØ, PÅL. 2019. "Is Imperialist Nationalism an Oxymor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5(1):18-44.

四、集中化：民族自治仅限语言文化和特定经济技术层面的法律问题，各民族在政治上服从严格的列宁主义原则，因此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联邦制；五、去俄罗斯化，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进行限制，在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也是最大的加盟共和国，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内部建立了多个非俄罗斯共和国和自治区，允许非俄罗斯人族裔采用本民族语言教育和出版¹。去俄罗斯化集中显示了苏联模式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苏联没有否定和取消俄罗斯族，但采取了实质性制度设置来遏制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化。

本文分三部分介绍苏联民族模式的历史。第一部分解释苏联民族模式的革命历史起源，进一步阐释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在苏维埃国际主义的框架下发明民族主义，试图通过驾驭民族主义引领世界反殖潮流，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第二部分解释苏联民族模式在革命后的延续，重点说明苏联的双重反向运动：一方面培育和强化各民族的政治文化认同，一方面又通过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加固民族之间的一体化。第三部分分析苏联民族模式在后苏联时期欧亚空间的复杂历史遗产：苏联时期的民族发明和一体化战略并不完全是徒劳的努力，而是留下了深刻的路径依赖。本文强调以下基本观点：苏联民族模式并不是建设常规民族国家的制度，而是一种服务于全球扩张和世界革命战略的制度设计；苏联民族模式虽然存在自掘坟墓的民族主义孵化器倾向，与此同时也积极通过各种权力手段利用和驾驭民族主义浪潮；苏联民族模式在塑造一体化方面的成就不容低估，对苏联继承国家的民族认同、地缘政治具有基础性影响力；苏联解体具有复杂多重的历史原因，苏联民族模式与苏联政治解体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待继续探索。

一、起源：对帝国-民族国家转型的革命性回应

布尔什维克为何执意将俄国改造为一众民族国家的联盟？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基于沙俄的多民族性。俄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族群帝国，俄罗斯人在人口数量上勉强超过半数。然而，简单的族群多样性并不能回答下列疑惑：为甚么苏联会区别于多数现代帝国、执行压制和消解主体民族的制度设计，而不是采取同化政策、製造“帝国民族”？为甚么苏联执意要在边陲地区建立形式上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授予特定族群自治权和自治区？苏联在彰显少数族群多样性的过程中，为甚么刻意从语言、地域、文化等“客观基础”层面界定民族，而不是主观的公民认同？为甚么苏联政权会公开赋予不同族群差异化的官方政治地位——有些族群获得了加盟共和国，有些是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还有些并不被承认为民族？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植根于苏俄革命进程。

苏联民族模式的最基本历史背景是人类社会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一转型自早期现代欧洲就已开始，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以普选制、普遍兵役制和全民义务教育为特征急剧加速，并且凭藉西方主导的殖民体系扩散到全球，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随着德奥、奥斯曼、沙俄等传统帝国解体达到高潮。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年代，摧毁帝国、建立民族国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迎合这一政治正确固然能够极大增强革命政党的动员力

¹ 关于苏联模式核心特征的论述，见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sch, Francine. 2005.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iser, Robert J. 1994.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Terry. 200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oeder, Philip G. 1991.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2 (Jan., 1991), pp. 196-232; Slezkine, Yuri. 1994.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2):414-52; Smith, Jeremy. 1999. *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17-2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uny, Ronald. 1993b.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与合法性，却也给信奉“跨国阶级联合重于民族战争”（Szporluk, 1991）的传统欧洲工人运动提出了严峻挑战；苏联民族模式由此溯源。它对民族国家转型的回应是一种创造性综合：民族国家在长期会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消亡，但在短期则是“必要的恶”，是统一市场形成、生产力进步、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制度所必需的政治外壳；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排斥跨民族的革命大联合，因此新兴的民族解放运动仍须处在统一的无产阶级集中领导下。苏联民族模式最重要的独特之处是由此衍生的二分法：布尔什维克坚信语言文化和政治经济是两个能够彼此分离的维度——社会主义运动可以一边庆祝弱小民族的语言、地域、文化独立性来取代传统殖民帝国，一边通过政治经济上的高度集中来推进革命和现代化。这构成了苏联民族模式的革命起源。用美国社会学家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的术语来说，苏联在起源上是一个族群民族主义与公民超民族主义的组合（Brubaker 1992）。

苏联民族模式的实质是以符合民族国家潮流的方式保留沙俄帝国的疆域，其对“统一性”的执念始终居于彰显族群多样性之上，但往往受到忽视。对统一性的执念具有多重来源。除了列宁主义所要求的无产阶级政党原则，实际的革命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说1917年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对于“民族自决”还有某些稚嫩的幻想，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很快意识到沙俄帝国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和防禦整体，任何人要稳固执政必须持续获取来自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矿、高加索的石油、中亚的棉花，以及波罗的海沿岸、芬兰的地缘政治屏障。这意味着重要的边陲地区都不能置身革命之外，否则革命无法进行¹。对统一性的执念也是布尔什维克与其对手竞争的产物。沙皇垮台后党派林立，边陲民族运动爆发，然而对布尔什维克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大部分全俄政党都主张保留统一的俄国，而不是任由边陲地区脱离，例如：立宪民主党要求在原沙俄疆域内建立自由的联邦制度，具有民粹派色彩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则坚持建立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主导的新国家，孟什维克右翼也主张限制分离运动，在统一的俄罗斯框架内推进革命，而1918年兴起的白卫军更是坚持俄国不可分裂。这些对手的强大影响力迫使布尔什维克不能在“民族自决”、“肢解俄国”口号上过于认真，而是必须借鉴采纳对手的思想纲领。

在边陲地区进行的文化与政治革命并非单纯的“民族自决”，而是增强苏维埃统一性的微妙手段。通过支持民族语言教学、鼓励宗教自由等立即可见措施，布尔什维克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革命运动、反对白卫军的进攻，从而深化政治上的跨族群统一。这一“文化-政治”组合率先在共产主义者占据绝对优势的鞑靼地区实现——通过建立示范性的民族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向沙俄境内和整个东方殖民世界宣告了一种帝国重组模式。在随后的革命中，苏俄政权与民族地区的进步运动、下层民众结成同盟，在民族政治解放的框架内开展阶级革命，消灭原先的统治集团，釜底抽薪式地取消了这些旧精英依附民族主义、勾连境外势力脱离苏俄的可能性²。苏联模式对族群文化的重新发明同样是巩固统一性的手段。在布尔什维克话语中，革命前“族群文化元素”包含太多与进步不符的内容，因而需要按照统一的标准加以改造：乡村土语需要进行现代化从而转化为能够言说工业科技和城市生活的语言；对妇女外出工作的父权制限制必须解除；一些传统的仪式风俗被批判为损害公共健康和人口质量；渔游牧牧生活需要变为定居，对其他族群而言，“神秘主义”以及阻碍族群之间沟通的宗教必须取消³。经过苏联重新发明的传统被称为“苏维埃现代性”，融合了俄罗斯和苏联其他族群的文化元素，是一种族群混合的统一性⁴。

¹ Zhou, Luyang. 2019.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as Foes and Friends: Comparing the Bolshevik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3):313-50.

² D'Encausse, Helene Carrere. 1988. *Islam and the Russian Empire: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³ Sundström, Olle. 2015. "Shamanism, Politics and Ethnos-Building in Russia." Pp. 75-98 in *Religion, Politics and Nation-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edited by Greg Simons and David Westerlund. Farnham, UK: Ashgate.

⁴ Amar, Tarik Cyril. 2015. *The Paradox of Ukrainian Lviv: A Borderland City between Stalinists, Nazis, and Nationalist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在王朝合法性崩解、旧疆域无法按照传统帝国模式重组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极力显示自己对时代变化的积极态度，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稀释和重塑作为前帝国中心文化属性、带有殖民征服色彩的“俄罗斯性”。沙俄断续曲折地采取了民族国家化政策，以沙皇制度、俄语、东正教和军事征服精神推进俄罗斯化。这些政策一概被视为革命对象，连同“俄罗斯性”一概受到批判——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将“俄罗斯性”与旧文化等同，认为后者与宗教、专制和殖民存在难以分割的联繫且总体上知识贫乏、与现代启蒙成就脱节¹。然而，对“俄罗斯性”的再造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俄罗斯”的概念被去主观化，成为了辽阔地理、丰富自然环境、雄厚工业基础和欧亚特殊中间位置的代名词，具有了世界革命基地和后方的意涵。遵照列宁“两个俄国”的指示（革命的俄国和反动的俄国），对俄国文化革命传统的系统性发掘也全面展开，除了布尔什维克零散提及的“革命民主作家”，苏维埃政权开始大规模整理古典文学作品，将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托尔斯泰（Leo Tolstoy）、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的文学遗产重塑为现代化教科书、反专制斗争经典和公民文化读本。在苏维埃政权的资助下，对革命运动史、劳动和工业史等传统史学薄弱领域的研究也在内战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起步。布尔什维克暗中借用人们对波兰、立陶宛等俄罗斯传统“重要他者”的敌对情绪，使红色爱国主义在苏波战争中达到巅峰。通过对“俄罗斯性”的巧妙再造，布尔什维克再一次将俄罗斯和俄语文化置于革命的先锋地位。

苏联民族模式对统一性的追求并不局限于内部俄罗斯文化再造和少数民族认同问题（纯粹从内部视角观察容易产生苏联片面彰显多样性的偏差），而是以攻为守、由外而内，通过输出革命、支持反殖民运动，从外部根除对俄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政治威胁。这一手法正是在支持“民族自决”的口号下展开的，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皮德蒙特原则”。苏联幅员辽阔，族群众多，有着许多跨国界居住的民族，特别是在靠近芬兰、波罗的海沿岸、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亚、远东等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交通的敏感地区。通过赋予这些民族形式上的建国权力（以及自治区权力），苏联政权试图吸引其境外同胞回归，这样既可以增加劳动力以发展苏联经济，也可以给邻国造成政治冲击，增加苏联的外交谈判筹码²。苏联通过在原帝国边陲建立一大批形式上的民族国家，积极塑造自身作为世界革命执行人的形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国号暗示了苏联不设地理和族群文化的限制，所有国家和社会最终都能够加入这一国际主义大联盟³。

支持边疆民族自决也是革命者面对强权的“次坏”选择，以保证旧俄国边界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二月革命”后，波罗的海、波兰、乌克兰和高加索等边陲地区进入事实独立阶段，建立了领土国家。与此同时，英法德等外国干涉武力在反殖口号下扶持当地独立运动、发展民族语言教育。这些情况并不让莫斯科感到愉悦。对此，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数管齐下，一方面采取相同的反殖口号，支持这些政权内部的盟友抗拒外部渗透；一方面与土耳其、波斯等国达成协议，阻止西方力量进入相关地区，把多边关系简化为双边关系。在直接以外交努力阻挡西方大国之外，布尔什维克也争取少数民族来反对获得西方支持的白卫军。白卫军在话语上号召重建“不可分裂的俄罗斯”，致使其在芬兰、波罗的海、乌克兰、南高加索和中亚遭遇抵抗，甚至与英法支持者龃龉。在力量暂时不可及时，布尔什维克通过声援民族自决加剧白卫军的困难处境。对特定边陲地区民族主义的支持也有利于苏俄限制外国干涉，比如苏俄成功利用了亚美尼亚对土耳其、拉脱维亚对德国、白俄罗斯对波兰的反感情绪，将后者维持在对苏俄领土完整危害较小的程度⁴。

¹ Zhou, 2019.

² Marples, David. 2012. *Belarus: A Denationalized 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p.27-28; Martin,

Terry. 1998.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0(4):833-34.

³ Smith, 1999.

⁴ Ezergailis, Andrew. 1976. "The Thirteenth Conference of the Latvian Social-Democrats, 1917: Bolshevik Strategy Victorious." in *Reconsideration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ited by Ralph Carter Elwood. Cambridge, MA.: Slavica

当然，把苏联建国过程完全化约为为理性选择的策略性计算是错误的，苏联模式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执念和知识基础。发展民族语言权利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即时发明。沙俄时期的边疆学者、人类学家、人种志专家和“东方学家”在革命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知识，其中一些知名学者如语言学家马尔（Nikolai Y. Marr）的影响力更是辐射到了遥远的后革命时代。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俄国东方学家在阿布哈兹、布里亚特等边疆区域发掘当地语言，编製语法和恢复民间艺术；语言学者声称能够在高加索地区找到欧洲文明的源头。一些进步倾向的边疆学者还对佛教等边疆地区信奉的宗教予以正面评价，认为后者不同于基督教，能够成为公民精神的载体。这一边疆文化趋势的背后是俄国寻找民族认同的强烈动力，通过发现和彰显俄国的族群多样性，同时证明俄罗斯对亚洲的西方性以及西方文明内部的特殊性¹。这些知识积累在革命前夕已经在学院和研究机构中制度化，在革命过程中则进一步与地方政权形成了紧密合作，进而影响到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选择。

苏联对民族革命的驾驭具有特殊的历史基础。沙俄是一个专制的落后大国，一些族群在革命前推行民族主义运动，然而或止于少数文化精英的自娱自乐，或脱离工农动员而一味追求分离自决、局限于狭窄的政治派别活动不能自拔，还有大量族群只有原始的初级认同。民族意识整体处于初始状态，使得革命和现代化成了认同形成和再造的契机，而认同重塑也可以反过来推动革命，将先前分散和内斗的族群纳入革命运动的洪流。彰显民族语言自主性、推动干部民族化可以部分满足民族权利诉求、彰显革命成就。沙俄在落后的同时，又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现代帝国。歷經数百年推动的早期现代化铸造了地区之间的共同市场、经济联繫和交通通讯基础设施联结，俄罗斯和边疆地区彼此有了较深的经济依赖和人员共居，难以通过快速的革命运动切断。因此，苏俄可以在时机成熟时运用武力优势摧毁边疆地区的独立政权，将这些区域重新纳入苏俄版图。最重要的是，苏俄革命适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动荡重组。面对俄国辽阔纵深的国土环境，外部势力的干预既不持久也不坚定，这是苏联能够迅速收回大部分领土的原因，也是其在接下来数十年中需要继续应对多族群问题的缘起。

二、维繫：超越族群多样性并构筑一体化

对苏联模式的主流批评，即“反向帝国”（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理论和“历史的报复”理论（Revenge of the Past），是针对苏联模式的自掘坟墓倾向——通过制度化地培育民族主义，让国家机器不堪重负，终于为自身的解体铺平道路²。按照上述理论，苏联自始至终是一座巨大的民族主义孵化器，一步步将自己架上了喷发的民族火山。“反向帝国”和“历史的报复”理论有诸多弱点，比如认为所有民族意识的觉醒都是苏维埃国家有意为之，忽略了苏联由于战争、移民和镇压造成的非期然民族形成。这一理论最主要的盲区是苏联对统一性的维护。自苏联成立之日起，它的历史就呈现为一种双重反向运动——既要制度化地持续发明民族、唤醒族群意识，又要从政治上将这些日渐被唤醒的民族牢固地聚合在一起。这对矛盾构成了苏联民族模式甚至整个政治、经济、外交体系演变的动力。苏联民族政策既是发明和再造民族的历史，也是现代帝国驾

Publishers; Minassian, Anahide Ter. 1996.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in the Armen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897-1912)." in *Transcaucasia,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hange: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edited by Ronald Su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Reynolds, Michael A. 2011.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Timothy. 2003.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¹ Tolz, Vera. 2011. *Russia's own Orient: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Soviet period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² 参见 Terry Martin 2001 和 Ronald Suny 1993.

驭和利用民族主义的历史。

早在革命年代，苏联民族模式的内部隐患就已经呈现，即所谓的多样性困扰：一些独立较早的加盟共和国谋求自主的货币和外交政策、从语言文化角度构建民族所产生的巨大成本，经济上片面扶助弱势族群在斯拉夫民族中造成的疏离感和无畏牺牲感，执念于“共同地域”强制迁移少数民族产生的严重社会和生态问题，民族地区干部本地化形成的离心风险，以及文化民族演变为政治民族、政治精英与传统家族部落势力汇合的趋势¹。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再中心化”的诱惑从来没有停止。如何在不正式修改苏联联盟结构的前提下保持各民族的聚合，就成为苏联历代领导人和决策者始终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简单粗暴、也最引起外界注意的“再中心化”方式就是俄罗斯化。俄罗斯化起源于斯大林与列宁的著名冲突——前者主张所有族群都以自治区而非加盟共和国方式加入“苏维埃大俄国”，而后者坚持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盟²。这次冲突之后，再也难以见到正式制度层面取消联盟结构、俄国化的官方行动。斯大林全面执政时期产生了许多重要经验，其中之一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能够产生震慑，有效防止政治民族主义，把族群多样性限制在语言、文化、地域的“客观性”框架内；对乌克兰等区域领导集团和精英知识份子的清洗即是如此。伴随着集体化的清洗，苏联并没有终止干部本地化政策，只是警告这一政策必须服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优先性序列（即所谓的“硬线”和“软线”理论）。斯大林时期的另一经验是可以策略性地动员社会上存在已久的族群仇恨情绪，在特定政治议题上实现目标，比如苏联的工业化有意识动员了反犹太、反穆斯林和反乌克兰情绪³。此外，将民族问题置于其他议程内以淡化其优先性也是策略之一。面对日益增大的工业化和军事压力，苏联政权倾向于任用经过短期培训的俄罗斯人或俄语使用者，这就在实际执行中非期然地削弱了干部本地化政策⁴。

然而，俄罗斯化只是苏联维护统一性努力的很小一部分。延续“十月革命”后的逻辑，“俄罗斯性”仍然是被限制和再造的。苏联的策略是加固既有的族群联邦主义观念——分割政治经济和语言文化维度，在坚持政治主权和党组织统一的同时，把苏联建成“世界最优秀文化遗产庇护者”的“第四罗马”⁵。俄罗斯人在苏联具有符号性的统治地位，表现在俄语通用和俄罗斯文化的覆盖性，然而这种统治地位缺乏实际政治权力和结构的支撑——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没有自己的党组织、克格勃和科学院，内部还被划分为多个非俄罗斯自治单位⁶。斯大林时期彰显沙俄帝王和将军英雄事迹的举措被批判为恢复封建糟粕，与个人崇拜和沙文主义等量齐观。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还试图通过经济科技大跃进、赶超美国、重建十月革命的未来主义导向，以此彻底摒弃斯大林时期重拾沙俄历史人物、俄罗斯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化的“回向过去”路径⁷。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时期没有完全撤除对俄罗斯文化的支持，而是重点扶持一些斯大林时期以“落后性”为由被打压的民间艺术，强调其“进步”、“知识性”元素⁸。

¹ Applebaum, Anne. 2017. *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 New York: Doubleday; Martin, 1998; Suny, 1993, *Revenge of the Past*; Mukhina, Irina. 2007.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² V. I. Lenin, 2010, *Lenin's Final Fight, Speeches and Writings, 1922-1923*. New York, Pathfinder, Sections 2 and 9.

³ Priestland, David. 2007. *Stal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bilization: Ideas, Power, and Terror in Inter-War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⁴ Martin, 2001.

⁵ Clark, Katerina. 2011. *Moscow, the fourth Rome: Stalinism,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culture, 1931-194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⁶ Slezkine, Yuri. 1994.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2):414-52.

⁷ Brudny, Yitzhak. 1998. *Reinventing Russia: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Soviet State, 1953-199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⁸ Jenks, Andrew. 2003. "Palekh and the Forging of a Russian Nation in the Brezhnev Era."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4(4):629-55.

随着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一体化措施以更文明的方式进行，并且经常与其他议程并轨而更为隐蔽。出于经济建设需要，苏联积极整合曾经的边陲经济体，重建和扩大其与俄罗斯本部的联系，力求改变革命前产业分布“内轻外重”的格局。苏联在1920年代大力引进和发展经济地理学，组织专家学者对全苏疆域和蒙古进行大规模国土勘探，边陲地区由此被纳入全苏经济规划。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式理解，苏联政权不遗余力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力求在各族群、加盟共和国之间铸造难以分离的依存性。长期推行的“社会主义均等化”经济地理战略，追求减少落后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把资源利用率、交通运输成本、区域比较优势等技术性效率问题置于次要地位¹。苏联政权积极推动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发，力求将这些族群推进到工业化阶段，从而建立它们对苏联其他地区的经济依存关系，并以此推进斯拉夫特别是俄罗斯技术人员的人口输入²。当然，“建立依附性”的措施既不都有刻意的反分离目的，也不总是得到惯性的推行。比如，赫鲁晓夫推行的农业垦荒运动由于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一度导致畜牧业发达的哈萨克斯坦成为肉类进口国，但这并不是刻意为之的建立依附性努力³。

行政区划上，苏联通过任意性的边界划定来防止分离主义，有时在加盟共和国境内密集建立其他族群的自治单位，有时则是合并自治单位。南高加索的加盟共和国最初以“外高加索联邦”形式“打包”加入苏联，利用亚美尼亚对工业资源的渴求限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独立倾向⁴。一些重要的战略枢纽、出海口以行政飞地形式被刻意留在苏共中央直接控制的俄罗斯联邦辖区，比如加里宁格勒；而克里米亚在多次区划调整中始终没有并入毗邻的乌克兰。苏联还通过边界重划隔绝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境外接壤。二战前夕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后，将这些领土划入西乌克兰，这样就实现了苏联对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陆地全包围⁵。苏联在中亚设立的五个斯坦共和国具有明显的人为边界性质，旨在建立多个新的民族认同，与革命前已经发生的人口同化趋势并不完全相符。这些共和国内部的自治区和自治共和国又在不停地调整、取消和重建。

军事防卫层面，苏联则有意识地采取了非均衡安排。在革命时期，许多非俄罗斯族群建立过独立的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曾计划在部分边疆地区设置特种少数民族部队，充分利用其军事传统和熟悉地形的本地优势。不过这些设置逐渐取消，有些是因为少数民族武装在内战中自我耗竭、随兵员补充和武器升级换代转化为常规作战单位，有些则在1930年代被撤销建制⁶。例行化之后的苏军确保武装力量特别是高技术兵种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籍军人为主（海军则特别吸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天然水手”）；非斯拉夫人或者服役于次要兵种如内卫和边防部队（以便应对斯拉夫地区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在指挥层级中居于低端，或不得驻扎东欧，或者参军服役人数极少、在本地域没有军事院校等基础设施，或者几乎没有军事力量驻扎。军人被要求在远离乡土的地域服役，每个军事单位尽可能保持族群比例的固定配置⁷。

最激进的努力出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苏联在有限度俄罗斯化、“苏维埃国际主义”和缔造“苏联民族”三个选项之间摇摆与混合。如果说“苏维埃国际主义”是俄国革命和苏联建国

¹ Kirkow, Peter. 1998. *Russia's Provinces Authoritarian Transformation versus Local Autonom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² Schroeder, 1990.

³ Ercilasun, Konuralp. 2017. "Soviet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Cultivating "Virgin Lands" in Kazakhstan." in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Life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Soviet Era*, edited by Timur Dadabaev and Hisao Komatsu.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⁴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Looking toward Ararat: Armenia in Moder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⁵ Fedor, Helen. 1995. *Belarus and Moldova: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p.106.

⁶ McMichael, Scott R. 1990. "National Formations of the Red Army, 1918-38." *The Journal of Soviet Military Studies* 3(4):613-44.

⁷ Rakowska-Harmstone, Teresa. 1990. "Nationalities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Pp. 72-94 in *The Nationalities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edited by Lubomyr Hajda and Mark Beissing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的“原教旨”，那么有限度俄罗斯化是运用俄语、俄罗斯文化符号来同质化多族群共同体的保守方式，而缔造“苏联民族”则是对“苏维埃”概念族群化甚至种族化的激进尝试¹。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一面是确保族群意识限制在文化和艺术层面，防止族群认同转变为挑战政治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措施表现在：积极介入重塑和发明特定族群文化，建立人员组成多样化的管理机构，任用革命后培养的大学院校学生、族群宗教研究学者、大众动员积极份子来稀释原先的宗族和宗教社区领袖的势力²；重建族群文化、促使其与苏联制度和其他族群适应，对特定族群的革命前文化做了大幅修改，去知识化、去宗教化甚至去仪式化³，大幅引进革命前的下层文化、民间艺术来对抗“资产阶级”、“僧侣阶级”元素——这些“新传统”通常是对革命年代某些现代化左翼（如伊斯兰改革运动）的某种借鉴和继承⁴；切割非俄族群的境外联系——苏联可以利用特定族群对其境外同胞实施影响，但限制境外力量对苏联施加反向影响力；塑造内外有别的面向，对外展示苏联扶助非俄族群的正面形象、赢得第三世界反殖运动的好感，对内则限制族群意识的政治化⁵。苏联的改造确实创造了新传统，比如对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改造混合了苏式共产主义理念和伊斯兰教义，并结合俄国特定区域的文化特征，以至在后苏联时期仍然保持着顽强韧性⁶。

苏联的对外战略延续了十月革命以攻为守、从边界以外保卫内部的思路。由此出发，彰显多样性的民族模式在苏联决策层看来反而是优势而非负担。即便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引发了严重的边境民族外逃现象，苏联政权仍然通过继续加强族群联邦主义、建立更多自治区来安抚在社会革命中受到重创的非俄罗斯人，从而既能够继续推进酷烈的经济社会改造，又能减轻在国际社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保持苏联的意识形态优势。这一策略经过二战前的反复实践，在美苏冷战期间迎来巅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扩散与英、法、荷、西、葡传统殖民帝国的瓦解同步进行。美苏作为后起的侧翼大国，是反殖运动的受益者和推动者。遵循族群联邦主义原则（“文化民族”+ 亲苏国际主义），苏联以民族国家建设者自居，成为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化的推手——苏联把境内穆斯林作为武器，扩大在中东世界的影响力⁷。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这种行为在反殖浪潮、两极对抗年代具有普遍性。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二战后美国的全球反殖运动、南斯拉夫和中国对反殖运动的介入都对苏联构成竞争，同时也合理化了苏联的以攻为守路线。

三、终结与遗产：后苏联空间的生存弹性

苏联解体被认为是苏联民族模式彻底失败的标志。然而，并不能因为苏联政权终结而否认一些重要事实：在看似自相矛盾的双重反向运动中，苏联毕竟稳定存在了七十年，其崩溃的触发机制并非民族问题，而是地缘政治压力下精英合法性丧失引起的自我毁灭性改革；苏联解体过程相对和平，没有像南斯拉夫和后殖民世界那样爆发全局性的内战；政治解体沿着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边界线发生，然后迅速稳固，并未陷入无休止的分裂；后苏联空间（Post-Soviet Space，指前苏联领土）主权国家之间残存着高度的一体化，这种统一性即便在欧盟和北约东扩的情况下仍保持着相当弹性；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表现出了更不受约制的新帝国主义倾向，频繁对前苏联“兄弟

¹ Weitz, Eric D. 2002. "Racial Politics without the Concept of Race: Reevaluating Soviet Ethnic and National Purges." *Slavic Review* 61(1):1-29.

² Keller, Shoshana. 2001. *To Moscow, Not Mecca: The Soviet Campaign Against Islam in Central Asia, 1917-1941*.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³ Yemelianova, Galina. 2015. "Islamic radicalisation A post-Soviet, or a global phenomenon?" Pp. 11-30 in *Radical Islam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dited by Galina Yemelianova. New York: Routledge.

⁴ Khalid, Adeeb. 2015. *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⁵ Yemelianova, Galina M. 2002. *Russia and Islam: A Historical Survey*. New York: Palgrave.

⁶ Rubin, Dominic. 2018. *Russia's Muslim Heartlands: Islam in the Putin Era*. London: Hurst & Co.

⁷ Bennigsen, Alexandre, Paul B. Henze, George K. Tanham, and S. Enders Wimbush. 1989. *Soviet Strategy and Isl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国家”使用经济杠杆甚至动用武力；苏维埃认同、跨国界认同在后苏联空间普遍存在，给后苏联国家的民族建设带来严峻挑战，在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更是造成了一众“事实国家”¹。这些都提醒我们，苏联长期以来营造统一性的努力不是完全徒劳的，苏联在发明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多处布局；对苏联民族模式予以全面否定似乎为时尚早。

苏联解体过程中，精英对于民族主义是勉强接受而非热烈拥抱。族群问题只是政治精英推动斗争的工具，而非初始目标。苏联宪法规定各共和国具有主权，是苏联建国神话的一部分，用作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武器具有很高合法性；有深厚的经济交通一体化和军事镇压能力存在，民族主义将有助于削弱当权者，却不可能演变为成功的分离运动。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和叶利钦（Boris Yeltsin）都积极鼓动自下而上的地方民族主义，试图以此赢得地方支持、打击政治对手。这种革命思维一直延续到后苏联初期——为防止苏共捲土重来，叶利钦巩固延续了苏联遗产，实质性扩大各联邦主体主权²；俄罗斯也开放了境外组织对本土民族运动的支持，假定境内伊斯兰运动都已经世俗化、不可能带来分离主义威胁³。这些看法不是没有基础的——直到最后一刻政治精英仍然拒绝相信苏联会彻底解体，即便是最早提出苏联解体的斯拉夫核心国家，也没有一步到位地提出独立主权，而是坚持某种形式的联盟，如俄白乌斯拉夫联盟、俄乌二元国家、切割波罗的海三国而保留苏联剩余部分等⁴。

至于苏联长期构筑的基础设施、经济和防卫领域的一体化是否起到了预期作用，答案非常复杂。一体化的后果清晰存在，苏联解体造成了大面积的经济停滞和防务混乱。在苏联时期严格的部委垂直管理下，企业和区域之间缺乏制度化和正式化的资源交换。崩解突然到来时，它们瞬间需要面对从来没有遭遇的变局。即使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样输出技术和人才的经济核心成员国，面对突如其来的脱钩，也遭遇了供给和输出渠道断裂、管理经验不足、行政机构瘫痪、技术人口外迁等严重问题⁵。安全防务上则出现了继承国家集体性的训练和战斗力下降，许多实行军事硬脱钩的国家长时间不能建立有效的防卫能力，大量武器装备被倒卖、盗窃和抢劫，导致领土和族群争端暴力化⁶；毒品交易、走私、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威胁也集中爆发。严峻的后果迫使多数国家放慢步伐，不同程度回到某种集体安全机制，也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选择性干涉行动提供了机会⁷。苏联遗留在各加盟共和国领土上的俄罗斯移民、少数族裔则构成了重大问题，这些人口担心会成为继承国家推行民族同化的牺牲品，积极寻求母国的保护，又反过来加剧了新政权对他们的不信任。

影响一体化效果的因素是复杂的，无法归结到单一向度。首先，理性选择具有一定解释力。一个民族或族群在苏联基础权力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和卷入深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切割的代价。在苏联体系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民族并不容易从技术上迅速脱离——尽管它们在话语上可以非常激进，但是这种激进会逐渐回到慢速甚至停顿状态，因政治家不堪承受巨大成本引起的公共压力和行政瘫痪。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族群不遗余力地脱钩。其次，民族认同的影响力也不能否认。虽然在波罗的海、西乌克兰等地区反俄情绪没有消除，超民族的“苏联认同”也确实存在，

¹ Bakke, Kristin M., Andrew M. Linke, John O'Loughlin, and Gerard Toal. 2018. "Dynamics of state-building after war: External-internal relations in Eurasian de facto states." *Political Geography* 63:159-73.

² Zamyatin, Konstantin. 2016. "Russian Political Regime Change and Strategies of Diversity Management: From a Multinational Federation towards a Nation-State."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15(1):19-49.

³ Dannreuther, Roland. 2010. "Russian discourses and approaches to Islam and Islamism." Pp. 9-25 in *Russia and Islam: State, society and radicalism*, edited by Roland Dannreuther and Luke March. London: Routledge.

⁴ Plokhy, Serhii. 2014.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⁵ Zon, Hans van.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ependent Ukrai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⁶ Danopoulos, Constantine P., and Daniel. Zirker (Eds.). 1996.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and Yugoslav Successor Stat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⁷ Clark, Susan. 1994.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Defining Security Priorities and Developing Military Forces." Pp. 177-206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Mandelbau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并与特定地区的区域认同结合在一起（比如苏联的“工业铁锈地带”），成为继承国家构建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¹。再次，预期的外部援助也非常重要。那些预期可以从文化相似度较高的邻国取得援助的民族国家（比如波罗的海国家之于北欧，犹太人之于以色列，德意志人之于德国，摩尔多瓦之于罗马尼亚），会不计代价地脱离苏联；反之，没有此类资源或预期的国家则继续倚靠俄罗斯和前苏联体系²。

一个地区在苏联解体时经历的动态过程也是影响脱钩的重要因素。一些激烈的脱钩行为实际上是无经验互动触发的。苏联时期一体化措施的设计假定体系处于稳定状态，而无法应对民主化、主权分割、战乱、地缘政治重组等无法预测的情景。苏联解体过程总体和平，但在局部地区的内战、边界冲突和叛乱仍然致使一些政权迫切需要分割苏联遗产，以获得立即可用的作战和经济自持能力，而另一些地区则由于独立而需要独自应对近邻的传统安全威胁和新生恐怖主义³。至于这种需求如何影响脱钩，又与一个民族国家原先的技术和人力储备有关。苏联的“工业化边陲”和跨加盟共和国移民项目对阻滞脱离的作用也是多面相的。在中亚地区，俄裔和工业人口都在反对货币去卢布化扮演了积极角色，而在波罗的海他们被当作间谍率先成为当地政权驱逐或强迫归化的对象⁴。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苏联重度经营了工业体系和军事部署。当地精英因此相信可以占据这些资源用作独立谈判的筹码，甚至将其转换为军工、旅游疗养资源盈利。此外，每个政权的政治特质也会影响脱钩轨迹。权力集中程度、对社会压力的敏感性、精英的行政经验（不少后苏联精英是没有政治经验的前异见人士或草根选举领袖）等，都会影响一个政权对脱钩进程的判断⁵。

在个体层面，一体化的后果也显示出复杂性。苏联政权鼓励跨族群通婚，认为这类婚姻可以淡化族群认同，实现“苏维埃民族融合”，而战争造成的移民、城市化、无神论教育和混居模式也确实塑造了大批跨族群婚姻。然而，这些通婚对子代族群认同的影响是多层次、不平衡的，取决于地域、通婚族群在苏联民族体系中的等级序列等多种因素。在中亚共和国，与俄罗斯人通婚产生的跨族群后代更倾向于认同当地的“加盟共和国民族”；在白俄罗斯等国，此类婚姻则产生了俄罗斯认同；俄罗斯人与“非加盟共和国民族”的通婚强化了俄罗斯认同⁶。大量散居在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后并没有形成完全同质性的跨国界民族认同，因而也不像二战前的德国移民那样成为母国渗透、重新收回“旧疆界”的工具。不同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因其社会地位不同，选择了不同层次的归化程度和策略，有些则不堪忍受新政权迫害少数族裔的反向民族主义而迁出⁷。语言对认同形成的作用也十分复杂——前苏联各个时期都存在大量俄语流利但坚持本民族认同的非俄罗斯居民⁸。

后苏联空间（post-Soviet space）统一性的重要推动力是俄罗斯。相比苏联时期隐晦、受制约和再造的“俄罗斯性”，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公开，意识形态内容上则日渐保守。俄罗斯国族建构与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个人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包含着诸多复杂因素，包

¹ Szporluk, Roman. 1998. "Nationalism after communism: reflections on Russia, Ukraine, Belarus and Pol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4(3):301-20.

² Luyang, Zhou, 2020. "After Empire: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1992 and 1993."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3(3):1-18.

³ Beissinger, Mark. 1997. "State Building in the Shadow of an Empire-State." Pp. 157-85 in *The End of Empi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S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Armonk, NY.: M. E. Sharpe.

⁴ Chinn, Jeff, and Robert Kaiser. 1996. *Russians as the New Minor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Republic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⁵ Zhou, 2020.

⁶ Gorenburg, Dmitry. 2006. "Rethinking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the Soviet Union." *Post-Soviet Affairs* 22(2):145-65.

⁷ Laitin, David. 1998.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⁸ Tolz, Vera. 2019. "Communicative Integration in Nation-States and Empir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5(1):85-89.

括个人崇拜的威权统治、君主制的仪式和审美，以及男性气概¹。对“男性气概”的推崇不仅构成普京个人的合法性基础，还拓展成了对俄罗斯整体国家形象的男性化赞颂（masculinity），以及对俄罗斯周边对手带有贬低性质的女性化²。普京治下的官方民族主义还宣扬被革命废弃的保守价值观，弘扬父权制、反同性恋运动，以及东正教传统。俄语作为后苏联区域建构的重要工具获得官方支持，但延续了苏联末期的“街头风格”——在削弱了政治攻击性的同时，也纳入了大量黑帮语言、俚语和脏话³。透过冲突制造“他者”也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方式。俄罗斯彻底官方化了民间存在已久但苏联时期受到压制的反乌克兰情绪。普京将乌克兰塑造为俄罗斯的重要对手，在宣传上把乌克兰颜色革命与法西斯运动、新纳粹相联系。这些做法在2014年俄罗斯夺占克里米亚时达到巅峰，之后则演变为绵延不绝的东乌克兰战事。

四、结论：革命、帝国与民族主义

1922年后的整个苏联历史即是俄国革命的漫长延续，是一场试图驾驭和操控民族主义的实验。显而易见的是，这场实验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目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美俄关系、欧俄关系出现新动向，断言苏联模式彻底失败、欧亚空间分崩离析为时尚早。本文勾勒了一幅革命借用帝国结构驾驭和操纵民族主义、同时以民族主义改造传统帝国空间的历史画卷。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帝国是民族主义背后的推手。面对民族国家崛起的压力，帝国远比城邦、部落等小型传统政体更敏锐也更有回旋余地，能够以退为进、以攻为守，把自身打造为民族解放的旗手，通过驯化民族国家大幅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在世界范围内，苏联的这一创举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但长期受制于巨型帝国的霸权。直到冷战时期各传统帝国相继解体，世界才逐渐转型为民族国家体系。美苏争霸在这一历史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美苏都以反殖革命建国，地缘上处于传统欧洲侧翼外围，接近欧洲海外殖民地；作为后起国家，它们有动力通过反殖赶超和取代传统霸主。在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号下，美苏在原殖民地世界争夺人心，推动民族主义革命，建立亲苏/亲美的新兴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最终形成与苏联模式密不可分，正是美苏这样的全球帝国最终奠定了民族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

苏联经验亦表明，民族问题只是帝国政治大棋盘中的棋子之一，民族问题既不是帝国的唯一关切，也不能决定帝国的生死。在革命大框架下，帝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综合立体的，民族认同的培育镶嵌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革命性社会结构改造和地缘政治博弈等诸多议题中。民族问题在苏联大部分时期处于边缘，被气势恢宏的社会改造、经济建设、边疆开发、战争行动所遮蔽，苏联的革命输出和全球扩张更是让许多早先的边疆成为了安全的内陆（比如东欧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后的西乌克兰）。综合的帝国国家建设构筑了强大的结构，使得单纯的民族意识觉醒并不能导致帝国的瓦解。沙俄垮台和苏联解体后的历史还表明，个别帝国政权的衰亡绝不等同于帝国核心控制力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帝国共同空间的消失，更不等同于帝国模式的消亡。苏联的历史教训在于，帝国对民族主义的操纵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混合着预期和非预期后果。粗糙的计算和意外的事件，都可能导致帝国入不敷出、被民族浪潮反噬，而驾驭民族主义的冒险实验又极大增

¹ Mikhailova, Tatiana. 2013. "Putin as the Father of the Nation: His family and other animals." Pp. 65-81 in *Putin as celebrity and cultural icon*, edited by Helena Goscilo. New York: Routledge.

² Riabov, Oleg, and Tatiana Riabova. 2014. "The Remasculinization of Russia? Gender, Nationalism,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Under Vladimir Puti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1(2):23-25.

³ Gorham, Michael. 2014. *After Newspeak: Languag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加了帝国协调内战、外交、经济、军事的复杂性，加大了腐化、发展失速和体制僵化的概率。复杂的民族关系平衡牵制着苏联的经济模式、外交战略和军事布局。苏联开创了传统帝国应对民族主义的新模式，但在现代国家建设的综合能力上弱势显著，这是其驾驭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得心应手的最主要原因。

【论 文】

美国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发展趋势¹

周少青²

摘要：福音民族主义是美国国家（民族）主义在 21 世纪的新表现。其对内主张国家认同与基督教信仰相融合，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外奉行“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福音派早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活动集中反映在所谓“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上。20 世纪 70-80 年代兴起的道德多数派是福音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的演练或尝试。2016 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福音派等保守主义由一种宗教保守力量，发展成完整形态的民族主义。应对美国内外部条件巨变、传统保守主义策略调整、白人种族主义的复兴、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互搏以及美国现代性危机是福音民族主义崛起的重要条件或历史背景。随着美国面临的内外矛盾的相对缓和及保守主义策略的相应调整，特别是随着公民民族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福音民族主义的动能将进一步减弱，但是另一方面，从“认同与终极信仰”的视角来看，尽管随着美国内外部条件的舒缓，以“文化战争”为表征的认同问题会相对纾解，但作为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与信仰支撑的“基督教国家”，福音民族主义的韧性仍将十足。福音民族主义将继续在美国内政和外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福音派；福音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公民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大体说来，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大致经历了教派（天主教、基督新教 [Protestanism, 下称“基督教”]）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三个阶段³。作为“例外论”的典型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独特发展路径。众所周知，美国的创建始于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之间的联合。但是推动它们联合起来发动独立战争并最终创立美国的力量，并不是推动西欧民族国家构建的那种民族主义力量。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也不是为了追求类似西欧民族国家的基于族裔、语言、文化或宗教身份认同一致性的民族主义目标；相反，它的目标是“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用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来说，独立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自由”的“理想”；为了守护“一个国家的自由”，潘恩甚至断言“没有美利坚，就没有整个世界（Universe）的自由”⁴。1784 年，政论作家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牧师大力颂扬美国革命，称之为“一场为了普遍自由的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传播了“对人类权利的正当情感和对合法政府的天然追求”，激发了

¹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21 年 12 月号，总第 188 期，第 38-55 页。

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³ 参见周少青：“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8-28 页。

⁴ 潘恩还声称，美利坚人所捍卫的自由远胜过古希腊罗马的自由，因为她“摈弃了对他人的奴役”。Thomas Paine, “The Crisis, No. V”,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 1, (Middletown, NJ: G. H. Evans, 1837): 131; 149.

反抗暴政的精神，为世界各地的被压迫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为创建一个可作为“自由、科学和美德的基地”的国家（empire）奠定了基础。¹

既然美国革命是一场“反对暴政”、“为了普遍自由”的革命，那它就不能是任何种族或族裔、语言、文化或宗教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革命。事实上，为了反抗压迫，争取独立和自由，北美十三殖民地人民与有着近乎相同身份认同的英国白人殊死较量。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斗争的胜利，这些扎根北美的英国殖民者还不惜与“母国”的宿敌法国结盟。

由于美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使得美国从一开始就与西欧经典民族国家以及其他后发民族国家所追求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西欧民族国家的精英奉行“一族一国”、“以族划界”理念，他们或以“想象的民族”，或以“实然的民族”，或以“半想象、半实然”的民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培育出一种高烈度的身份政治——民族主义²。而那些后发的民族国家则程度不同地接过了经典民族国家（同时也是殖民者）手中的民族主义火炬，并结合自己的国情将其煅烧得更加炽热。³

相形之下，创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力量或理念，很难说是民族主义的。从其后来发展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来看，推动美国大规模扩张和进行外部干预的力量或理念也不是民族主义的（至少不是西欧国家那样的民族主义）。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根植于深处的清教主义基因⁴，美国“无差别的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面纱背后始终半隐半现地萦绕着“基督教民族主义”⁵的影子。尤其在美国家国力处于上升时期之际，往往被无差别的“自由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所遮蔽。在国家处于重大的政治或社会转型之际，或者在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或挫折的情况下，则会展现出一种特殊的“宗教民族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

进入 21 世纪，在内外种种危机的夹击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1960 年代以来相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受到美式基督教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的严峻挑战。本文所谓“福音民族主义”，指谓与传统自由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保守的宗教与政治民族主义，它以福音派为主干和标识，杂糅了各类右翼、宗教右翼（包括所谓新、老右翼）甚至“另类右翼”，特别是聚合了多种力量而成的（新）保守主义——事实上，正是由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或者说与民族主义的合流，才促使以往以改造社会、影响国家政治议程为目的的宗教福音主义，开始全面转向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继而以福音基督教的价值理念型塑政府和社会的国家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需要强调的是，“福音民族主义”这一提法，并不意味着所有福音新教徒都是福音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或成员。事实上，有不少福音派新教徒是自由主义者。也有不少非基督教徒是福音民族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福音民族主义对内主张美国国家认同与基督教信仰相融合，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外奉行“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美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首先介绍福音派的基本教义及早期政治和社会运动，指出

¹ Richard Pric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Means of Making it a Benefit to the World* (Boston: Re-printed by Powars and Willis, 1784), 3-5, 转引自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史学集刊》，2017 年第 6 期，第 15 页。

² 有关民族主义是一种高烈度的身份政治的论述，参见周少青：“21 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内部资料，2020 年第 6 期），第 11-15 页。

³ 例如在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也是一种炽热的宗教信仰。

⁴ 清教主义是美国形成的基因密码，一方面坚持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体对上帝的虔敬、眷恋和精神依附以及道德上的自律，清教徒自视为“上帝的选民”，他们试图通过教会改革使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影响整个国家。前者最终孕育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所谓“公民民族主义”，后者则成为“基督教民族主义”或本文将要讨论的“福音民族主义”的酵素。

⁵ 所谓“基督教民族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试图建立泛基督教国家的努力。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那片土地上的人们都试图组建一个能够囊括所有基督徒的宗教-世俗国家，以代替逝去的罗马帝国，但是都没有成功。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基督教民族主义是指那种试图将基督教属性与国家认同合二为一的理念及行为。参见 Louis L. Snyder, *Encyclopedia of Nationalism* (St. James Press, 1990), 282.

其侧重于共和、传统、保守尤其是“基督教特性”的一面，为福音民族主义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观支撑；接着提出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兴起的“道德多数派”及其政治实践是福音民族主义的一个初步演练；然后论述 2016 年美国大选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当选，标志着福音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最后在分析了福音民族主义崛起的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势做出研判。

一、基督教福音派的早期政治及社会活动

（一）福音派的意涵及其主要教义

“福音派”（evangelical）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福音”（gospel），意为“好消息”、“可喜的讯息”等。历史学家认为，宗教改革中的领导人威廉·廷德尔（William Tyndale）是第一个使用英文“福音派”词汇的人。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第一个使用拉丁化“福音派”（evangelium）词汇来描述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新教教会群体。福音派正式形成于 18 世纪。根据宗教史学家凯瑟琳·布兰克丝（Catherine Brekus）的研究，福音派是 18 世纪基督徒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信仰形式。但是在此之前，宗教改革者就已经用“福音主义”来描述他们的信仰了¹。18 世纪福音基督徒的三个基本特征是：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重生以及主张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在此期间，涌现出许多致力于福音运动的神学家和布道者。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美国的绝大部分基督徒都可以归类为福音派教徒。后来围绕《圣经》真理性等问题，新教徒出现了严重分化，那些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基督徒形成主流派，保守派则被划归基要派，而基要派中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是福音派教徒²。二战期间及战后，福音派的组织化程度渐次加强。基督教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和全美福音派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就是这一时期成立的。

从教义上看，福音派有五个基本特点，一是主张基督徒必须经过“悔悟”、“悔改”而获得“重生”或“新生”；二是确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基督徒最高的权威；三是重视耶稣被钉十字架及其拯救效果；四是坚持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福音；五是普遍相信“世界末日”一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福音派有着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组织系统和明确的教义，但是在实践中区分“谁是福音派教徒”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宗教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曾经打趣说，在 1950 至 60 年代，福音派基督徒是“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但是当已故著名福音派领袖葛培理（William F. Graham）牧师在 1980 年代后期被要求定义“福音派”这个词时却回答说：“实际上我也想问别人这个问题”。对民意调查者来说，福音派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对牧师来说，福音派是一个教派或教义学术语；对于政治家来说，它是“白人基督教共和党”（white Christian Republican）的同义词³。现实中，有人认为凡是保守的基督徒都属于福音派；也有人认为福音派教徒并不都是基要派，因为它注重学术研究、强调各宗派的合作以及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还有人认为，不能称天主教徒为福音派，理由是福音派是基督徒的专用词汇，基督教起源于与天主教的分歧；此外，还因为天主教虽然接受《圣经》的权威，但也赋予教会和教宗相应的权威，等等。在“谁是福音派教徒”这一问题上，美国社会的分歧颇大。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界定“福音派”的标准五花八门。从最宽泛的“只要承认自己是重生基督徒”到比较严格的须同时满足福音派教徒界定的标准，反映了美国宗教保守群体内部的光谱色差。

目前福音派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⁴。在福音派基督徒已成为一支极为重要的政治和

¹ 周少青，“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历史轮回”《周评天下事》2019 年 9 月 30 日。

² Roger E. Olson, *The Westminster Handbook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4), 37.

³ Jonathan Merritt, “Defining Evangelical”, *The Atlantic*, 7 December 2015.

⁴ 争议数从 7%至 47%不等，参见 Jonathan Merritt, “Defining Evangelical”, *The Atlantic*, 7 December 2015.

社会力量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界定“谁是福音派教徒”已成为影响美国大选、社会舆论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的一件大事。限于篇幅，本文无意加入界定“福音派”的行列。但是必须指出，所谓“福音派”并不是一个有明确指向的教派。在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派别中都存在着福音派，其中改革宗、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及灵恩派中的福音派尤多。历史上，福音派曾是“基督教复兴主义”（Evangelical Revival）的同义词，现实中，福音派有时意指宗教保守群体或宗教右翼，有时泛指基督教中的主流派，由此可见福音派的历史和现实影响之大。

总之，福音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社会和政治现象。它首先是宗教改革的重要产物。数百年来，福音派在反对天主教的体制化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压迫或限制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面对世俗主义潮流的强大冲击，福音派在组织化程度、维护传统婚姻家庭、反堕胎、抑制同性恋群体的权利，特别是在捍卫所谓“宗教自由”方面与天主教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与天主教合流的趋势（也出现了“福音派天主教徒”这样的称谓）。这一方面表明，“基督教的美国”始终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自我维系的内生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基督教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或自由民族主义两种势力的争斗——而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相对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平衡——在其他变量恒定的情况下，每当公民民族主义或自由民族主义过度伸展时，基督教民族主义就会活跃起来并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

21世纪以来，美国国内政治明显过度“自由化”，在民主党连续多年的执政过程中，女性自由堕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宗教保守群体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强烈不满，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白人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下滑，以及大国干预或入侵导致的难民潮及恐怖主义等，最终导致有着重要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福音派教徒走向历史前台，并与急于寻找新的转机的传统保守主义政党共和党合流，形成影响深远的福音民族主义。

（二）福音派的早期宗教、政治及社会活动

福音派早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活动集中反映在所谓“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上。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历史上一共经历了四次所谓“大觉醒”，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美国的政治及社会发展走向，而引领大觉醒的力量正是福音派基督徒。

第一大觉醒发生在18世纪30至40年代，是欧洲大陆虔敬主义和英格兰福音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继续。面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体制化教会严苛的形式主义威胁，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等保守（福音）派领袖积极奔走于各个殖民地，富有激情地提出和论证了许多影响美国政治和文化的神学论断。他们强调人类的“原罪”，认为只有向神认罪，寻求赦免，接受神的恩典，才能得到拯救；并强调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联系，认为宗教不应该是体制化或制度化的，而应该是个体化和随意的。爱德华兹等人“复兴”基督教的运动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强调个体与上帝的直接沟通，使得大量可能被视为“异端”的教派合法化，客观上扩大了宗教自由，提升了宗教宽容（殖民地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欧洲的受宗教迫害者），也促进了殖民地民众的平等意识；教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了北美的民主化进程；同时，大觉醒在思想上、政治上强化了北美十三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尽管由此所产生的争论导致殖民地基督教各派分裂为支持复兴运动的“新光”（new light）和反对复兴运动的“老光”（old light）两派，但作为各个殖民地第一次所共同经历的重大事件，大觉醒客观上为十三殖民地的联合、继而走向独立建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亨廷顿在谈到大觉醒对美国革命影响时引用了哈佛大学学者艾伦·海默特（Alan Heimert）的话：“福音动力是热烈的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化身和工具。在革命前美利坚的福音教会中，铸就了日后体现美国早期民主制思想的各个论坛和民众的大联合”，当时美利坚将近人口一半的公理会、长老会和浸礼会的广大教友“接受了千禧年思想”，而“这些千禧年教派正是美国革命的最坚定支持者”

1。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场大觉醒的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了促进殖民地人民的团结或联合，更不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近代民族国家；相反，它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欧洲启蒙思想漂洋过海带来的科学、理性及逻辑精神对宗教的冲击；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宗教过度体制化所引起的教堂出席率低等问题。但是从结果上看，大觉醒唤醒的不仅仅是殖民地人民的宗教虔诚之心，提振的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在参与宗教复兴的过程中，殖民地人民的自主、平等意识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公共道德重建的信心得到极大锻炼，美利坚人的整体意识也得到很大提升²。不仅如此，大觉醒还使得殖民地人民形成了一种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的习惯。

后来，美国社会又于19世纪20至30年代、90年代以及20世纪50至60年代经历了第二至第四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的主要议程是废奴运动，这场被誉为“美国第二次革命”的“福音传道和奋进主义运动”最终动员起千百万民众参加轰轰烈烈的解放黑奴事业。第三次大觉醒则直接与争取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平民主义和进步党主义运动相联系，主张反托拉斯措施、妇女选举权、公民立法提案权、公民复决投票权、罢免权、禁酒、铁路管制和直接初选。第四次大觉醒又与美国的两次政治改革运动密切联系：第一次是结束法律上和体制上对黑人的歧视和隔离，第二次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保守派改革运动。³

纵观福音派四次大觉醒运动所推动的政治、宗教、社会议题，我们发现，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福音派几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社会议题上都存在着两面性：第一次大觉醒一面追求宗教虔敬，另一面却在不经意间锻造出世俗的“美利坚意识”。从追求宗教虔敬的维度来看，一面强调人的原罪及只有通过上帝的恩赐才能获得救赎，另一面则强调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及人的平等性。第二次大觉醒一面“追随上帝”废除奴隶制，另一面却以上帝的名义维护奴隶制（战争中南北兵士都高唱“上帝降临光荣”，都认为自己是在为“上帝”的事业而战）。第三次大觉醒一面追求平民主义及进步主义的平等理念。另一面却普遍相信在美国出生的白人的优越性、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道德的优越性。第四次大觉醒一面谴责政治和体制上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隔离与歧视，另一面却寻求保持既有特权的新路径和方式（“道德多数派”的崛起就是典型例证，下详）。福音派主导的大觉醒运动的这种两面性，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传统政治和社会文化。其侧重于民主、自由、平等的一面为左翼或进步主义力量所继承，发展为自由民族主义；而侧重于共和、传统、保守尤其是“基督教特性”的一面为右翼或保守主义力量所承继，最终发展为以福音派为标识的宗教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

二、“道德多数派”及其政治实践：福音民族主义的一个初步演练

第四次大觉醒运动最终导致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被宣布为非法。自此之后，福音派及其他基督教保守群体开始以宗教保守主义的形式追求传统的白人优越主义，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的裁决结束了美国黑人白人不同（公立）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宣布“隔离但平等”的法律原则违宪。从此，那些不愿意与黑人同校的南方白人纷纷逃离公立学校，建立自己的“隔离学校”——白人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往往以宗教学校的名义享受免税待遇。当公开禁止不同种族男女约

¹ Alan Heimert, *Religion and American Mind: From the Great Awakening to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4, 19. 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第57页。

² 亨廷顿认为，大觉醒使得“美利坚人第一次联合起来，开始形成美利坚民族意识，而不再是只有地域意识”。他引用约翰·亚当斯1818年的话指出“革命兴起于战争爆发之前。革命发生在人民的心灵之中，发生在他们对待责任与义务的宗教情感的变化之中”。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第58页。

³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第58-59页。

会的福音派院校鲍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遭到美国国家税务局查处，面临失去免税地位之际，一位名叫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的共和党活动家，在种族隔离主义分子、啤酒大亨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的赞助下，与南方宗教领袖杰瑞·法维尔（Jerry Falwell）等结成联盟，并成功展开游说，软化国税局的执法立场。从此，一个在宗教及道德观念上强硬、保守而著称的所谓“道德多数派”组织形成。

“道德多数派”是一个以福音派为主干的跨教派的政治组织，于1979年成立。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维权运动等造成的所谓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危机，直接动因则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如允许女性堕胎、禁止公立学校祈祷以及参议院批准旨在推动两性平权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1972）¹等被认为“侵害”了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司法及立法行为。在道德多数派主要领导人法维尔看来，最高法院做出的堕胎合法化裁决比以往任何的裁决对国家带来更大的打击；他还把做出禁止在公立学校祈祷的裁决的九名大法官斥为“白痴”，认为这是在用“不受限的权力向基督徒发动战争并对抗全能的上帝”；而试图使男女完全平权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则将全面颠覆基督教的价值观。²

在诸多挑战基督教价值观的（司法）行为中，最让宗教保守人士尤其是福音派难以容忍的是1973年将堕胎合法化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以下简称“罗伊案”）裁决。对他们来说，将堕胎合法化作为国家法律，不仅是“冒犯性的、野蛮的、粗鲁的”，也是对上帝“宝贵作品”的亵渎，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罗伊案”的裁决使他们中的不少人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并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入政治领域才可能推翻“罗伊案”裁决。³

但是在进入政治领域问题上，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面临着很大的障碍：一是长期以来，他们总是给政治贴上肮脏的标签，认为人们应该远离它；二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福音派等宗教保守文化都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动员信众参与政治活动有些不现实；三是美国社会的政教分离传统构成阻止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参与公开政治活动的“天然防火墙”。然而面对美国社会和道德日益衰落、堕落，以及对上帝的公开背离，法维尔等宗教保守领袖决心改变不参与政治甚至厌恶参与政治的传统，团结带领信众用实际行动夺回“上帝或基督教的美国”。法维尔们开启了福音派公开政治化的新里程。

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道德多数派搁置教派争议和分歧，主动吸收基督教、摩门教、天主教乃至犹太教群体中的保守分子（其领导层除了福音派的法维尔以外，还有天主教徒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和犹太人霍华德·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⁴，将他们凝聚在反堕胎合法化、女权主义、同性恋及《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旗帜下。为了争取非宗教选民、社会保守派及一般社会公众的支持，道德多数派精心设置议题、打造话语体系。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将反堕胎、反同性恋以及反《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措辞巧妙置换为“支持家庭”（*Pro-family*）或“救救家庭”（*Save Family*），号召人们为“保护家庭”而斗争。法维尔认为，这种在政府议程中促进“积极的家庭价值观的愿望”不应被视为“神权政治”，也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一个宗教议程，它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的和道德要求。在另一些情况下，道德多数派将其保守的宗教和社会

¹ 参议院批准后，该法案还需提交给各州立法机构在七年内批准——后来批准的截止时间延长至1982年6月，但是直到2020年该法案才得到38个州必要多数批准。

² Eileen Oginitz, “Evangelicals Seek Political Clout”, *Chicago Tribune*, 3 January 1980.

³ Doug Banwart, Jerry Falwell, “The Rise of the Moral Majority, and the 1980 Election”, *Western Illinois Historical Review*, vol. V (Spring 2013). 133-57.

⁴ 在此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基督徒与天主教教徒在政治及许多宗教、社会议题上冲突不断，而且就连福音派自身都分裂成相互怀有敌意的基要派、五旬节派和新福音派等。参见 Wilcox, “Laying Up Treasures in Washington and Heaven: The Christian Right in Evangelic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17, (January 2003): 23.

议程装点成政治爱国主义。1976年法维尔利用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举办“我爱美国”的信众集会。在集会上，法维尔表示，尽管美国过去可能有缺陷，但现在已经得到纠正。他向美国政府保证仍然有许多爱国人士爱着这个国家并支持政府和军队的工作。法维尔警告包括福音派及其他宗教保守群体在内的全体选民，“美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上帝的信任和信心”，声称“美国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如果上帝松开抓着美国的手，那么一切都会结束”。¹

除了上述“统战”策略以外，道德多数派还试图借助于传统（政治）保守主义的议题而与上述群体形成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为此，他们将矛头指向联邦政府的福利计划，认为福利支票是在奖励那些拒绝工作的懒人。法维尔宣称那些制定福利政策的人都是“拒绝按照《圣经》原则生活和工作的世俗人文主义者”，这些人想方设法向努力创业、辛勤工作的新教徒征税，以养活那些无视基督教职业道德和伦理的人²。此外，道德多数派还主张减税、增加国防开支。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持续支持以色列和强力反共，等等。这些主张和诉求具有浓厚的政治保守主义色彩——尽管法维尔坚持认为，道德多数派的主要议题是道德而不是政治。

道德多数派阵营里很快聚集起包括福音派及其他宗教保守派、政治与社会保守派在内的数百万成员。在法维尔的带领下，他们昂首进入政治竞技场。他们迎来的第一场政治较量便是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大选期间，道德多数派快速动员起来，积极筹款，四处游说信众，鼓励他们进行选民登记。在道德多数派等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里根（Ronald W. Reagan）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卡特（James E. Carter）³。道德多数派成员认为，正是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发动的强大支持网络才使里根以压倒性优势战胜试图连任的卡特⁴。他们因此有理由相信，里根政府将会在结束堕胎合法化、恢复公立学校祈祷、取消同性恋者的特殊权利、重建男性和女性传统性别角色以及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生效等问题上给予回报。一些成员甚至把里根与摩西相提并论，认为他能带领他们“走出不义的荒野”。⁵

里根入主白宫后，道德多数派成员选择“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直接行动，游说国会议员，试图通过一个名为“生命法案”（Human Life Bill）的宪法修正案（道德多数派奉行的价值理念是“生命始于受孕，胎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推翻“罗伊案”裁决。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旧金山积极行动，企图将同性恋行为入罪化；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不同渠道向里根施加压力，希望里根在恢复传统的价值观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里根并不想在社会改革领域中挑起争议。上任不久，他就向道德多数派阵营发出了讯号：当务之急是税收和经济领域改革，而不是价值观改革。当然，为了回应在大选期间做出的承诺，里根治下的司法部和财政部于1982年1月撤销了美国国税局取消鲍勃琼斯大学免税地位的决定，但是这一行为遭到迅速而激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这是用纳税人的钱来鼓励公开推行种族歧视的鲍勃琼斯大学。为了进一步应对政治上激烈的反对声，里根随后向国会寻求禁止对施行种族歧视的学校免税的立法，此举被认为是对包

¹ Daniel K. Williams, “Jerry Falwell’s Sunbelt Politics: The Regional Origins of the Moral Majority”,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vol.22, no.2 (April 2010): 125-147.

² Daniel K. Williams, “Jerry Falwell’s Sunbelt Politics: The Regional Origins of the Moral Majority”,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vol.22, no.2 (April 2010): 125-147.

³ 实际上直到大选前的几个月，福音派等才最终选定罗纳德·里根为他们的代理人。在他们看来，虽然里根不是一个完美的代理人，但他肯定会好于自称“重生派”福音基督徒的卡特，因为后者在位期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立法或行政令来抚慰福音派。参见 Doug Banwart, Jerry Falwell, “The Rise of the Moral Majority, and the 1980 Election”, *Western Illinois Historical Review*, vol. V (Spring 2013). 133-57.

⁴ 尽管很难判定道德多数派对里根的成功当选到底起到多大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对法维尔和他的选民来说，重要的道德问题已成为“里根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参见 Michael Sean Winters, *God’s Right Hand: How Jerry Falwell Made God a Republican and Baptized the Religious Righ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2), 4

⁵ Bruce Buursma, “A New Crusade”, *Chicago Tribune*, 31 August 1980.

括道德多数派在内的宗教保守势力的一记响亮的耳光¹。不仅如此，里根在任期间，参议院关于反堕胎的两项宪法修正案从未付诸表决；交付表决的关于恢复公立学校祈祷的宪法修正案也因为缺乏足够的票数支持而夭折，显然这一结果与里根消极或置身于事外的态度不无关联。最让道德多数派难以接受的或许是，1981年春里根提名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 O'Connor）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职，而她曾因支持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和投票支持堕胎权利而遭到许多基督教右翼领袖的批评和责难。

事实上，直到里根卸任，道德多数派所期冀的“社会改革”或“价值观重塑”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从把里根视为摩西到对他的绝对失望，道德多数派深刻地认识到了宗教热忱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政治游戏的规则远比仅凭虔诚和激情的宗教要复杂得多。1989年道德多数派组织解散，里根也结束了总统生涯。

尽管道德多数派仅仅存在了十年，但其带给美国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第一，道德多数派及其运动使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力量公开政治化。在此之前，福音派及其他宗教保守群体往往视政治为“肮脏的游戏”。道德多数派第一次在大选中公开动员基督教选民，并且将政治列为教会的优先议程。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道德多数派在政治上变得异常活跃，他们积极参与选举，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候选人，并制作所谓“不虔敬者”名单，以阻止“不敬上帝者”当选。第二，道德多数派将宗教重新带回公共领域。基督教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而且信教的虔诚度已然成为衡量公共决策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第三，道德多数派在堕胎、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等有关基督教家庭价值观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引发了美国左翼、自由派及其他进步主义人群的强烈反弹，使得这一人群更加积极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这一点为后来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埋下了隐患（下详）。第四，道德多数派开启的以“宗教权利”追求宗教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的政治范例，为美国的政教关系及政党政治的发展添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道德多数派及其运动使得美国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围绕宗教问题开始激化。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选择共和党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福音派选民从此成为共和党的最大票仓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共和党也把福音派选民或基督教保守力量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重要基础加以培育和利用。所有这一切，对后来美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及政教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道德多数派的出现是美国政治、宗教、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种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从表层原因来看，道德多数派的形成是为了应对20世纪50至60年代发生的政治、社会及文化转型所带来的冲击——在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看来，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性道德缺乏，联邦最高法院禁止公立学校的集体祈祷和《圣经》诵读的裁决、堕胎合法的裁决，以及允许学校教授进化论，等等，严重破坏了基督教所倡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但是从深层次原因来看，道德多数派的出现是美国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勃兴的一个重要前兆：如前所述，在种族隔离被宣布非法之后，那些不愿意与黑人同校的白人家长便选择成立宗教私立学校作为继续施行种族隔离、践行白人优越地位的场所。在1964年禁止歧视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等系列法案颁行之后，一些著名的基督教教育机构如鲍勃琼斯大学仍然顽固地推行种族歧视，该大学公开宣称，正如《圣经》明确地区分了两性及性别角色一样，种族区分也是《圣经》的应有之义。当卡特治下的国税局威胁取消这些公开推行种族歧视的宗教教育机构的免税资格时，引起了这些教育机构的激烈反对，它们所倚重的一个重要理由即所谓“宗教自由”。显然，不论是选择与黑人等有色族裔隔离的宗教学校，还是在宗教学校继续践行种族隔离政策，其深层次的目的都是为了恢复或者维护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基于制度和体制的白人种族主义。之所以采取宗教的形式或者说以“宗教自由”为名目，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种族优越

¹ Aaron Haberman, “Into the Wilderness: Ronald Reagan, Bob Jones University, and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hristian Right”, *The Historian*, vol. 67, no. 2 (Summer 2005): 234-253.

论难以为继。

种种迹象表明，20世纪70至80年代兴起的道德多数派是21世纪福音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的演练或尝试。但是，由于1960年代以来左翼与进步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加之美国面临棘手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另类全球化所带来的贫富分化、身份政治和难民危机等问题还远没有显示出其效应，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所倾力推动的福音主义并没有产生他们所期冀的结果。从美国政党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当时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远没有今天分化——这不仅可以从一些民主党议员也支持道德多数派所发起的“支持生命”宪法修正案这一现象看出，更可以从1984年总统大选里根获得95%的选票这一历史事实感知。在政党政治正常运行的历史条件下，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均基本信守着各自传统的价值取向——即便是有所调整或改变，双方均不会严重背离其一贯的价值原则——这也是为什么道德多数派试图将共和党及里根总统框定为其价值观代理人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政治保守主义的主流——共和党拒绝成为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的代理人时，所谓福音主义只能停留在民间层面，成为一部分政客和宗教信众的梦想。当然这并不是说，道德多数派时期的共和党及其总统里根在对待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的诉求问题上严守中立。事实上，迫于经济议题、多样化的选民、民主党控制着参议院以及左翼与进步主义势力的压力，里根在有意忽略道德多数派关于重建国家道德诉求的同时，任命了大量的保守主义联邦法官，这些大法官加上里根本人对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一贯支持，对后来宗教保守主义的崛起乃至福音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自里根时代以来，以福音派为代表的保守选民始终把三分之二的选票贡献给共和党的重要原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道德多数派奠定了共和党与福音派联姻的历史基础。在此后数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和党与福音基督徒保守势力在政治及价值观上共进共退，共和党利用政治舞台“守卫”甚至提升福音派的价值观，福音派则给予共和党坚定的票仓支持，直到双方完全合流为福音民族主义。

三、特朗普当选：福音民族主义正式形成

21世纪以来，世界及美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道德多数派当年所追逐的福音主义理想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了实现的条件。首先，从全球角度来看，随着宗教复兴运动不断深入，各种形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勃兴，这给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和示范；其次，从美国国内来看，随着新自由主义、世俗化、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科技主义和“新历史虚无主义”¹的叠加性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贫富分化、种族冲突、精英分化、民粹肆虐、政府威信受损、家庭、婚姻不受重视、传统的道德和宗教共同体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力下降，等等。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价值观撕裂或所谓“文化战争”和贫富分化。

从价值观撕裂或“文化战争”的视角来看，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权革命的推进以及少数族裔在经济、社会领域实现相当程度的平等权，美国的左翼及进步主义阵营逐渐从传统的以改善包括少数族裔及白人下层的经济、社会状况为使命转向文化领域，尤以倡导少数族裔、女性及同性恋群体的“文化平等权”为己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数十年来，不仅包括黑人在内的美国少数族群文化在现实中得到追捧，而且在新美国革命史学（New Historiograph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框架下，美国的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少数群体获得了美国建国史的“追溯性承

¹ 最为典型的是“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的极端左翼，他们超越时空地引证“自由”、“平等”理念，大肆诋毁建国先辈、破坏雕像、碑文等历史符号，非历史地看待和评价美国的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符号，严重地动摇了美国的国基。笔者将其称为“新历史虚无主义”。

认”¹。与此同时，女性的堕胎权和同性恋群体的平等权获得了极大改善，后者还获得了结婚的平等权利。此外，这一时期也是移民政策较为宽松的历史时期。这一切变化在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看来，严重损害了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和美国国家特性。从贫富分化的角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歌挺进的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大量制造业外迁，严重威胁到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技能相对单一的白人中下层群体的生存和生活。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社会衰退已经蔓延至白人工人阶级。与此同时，农民也因高企的遗产税及环境保护立法而陷入困境。

再次，在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重重压力下，2015年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发生明显转向。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为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杂糅了各种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复合物，其中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主义是两个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它们分别简称为“自由派”和“美德派”。在二战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主流保守主义者在民族主义者面前基本保持着定力：冷战结束后，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些传统主义者率先提出“美国优先”议程，但这种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议程没能影响保守主义主流派。然而，随着美国国内外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至少自2015年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建制派开始受到“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或所谓“爱国主义”的有力挑战。以特朗普主义（Trumpism）为标识的新民族主义者，将斗争的矛盾同时对准传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建制派。他们批评保守主义建制派：对内，放任民主党政府“无限制的”多元文化主义，冲击英语地位、美国传统历史史观和学校教育；在移民融入问题上，放松美国统一性标准，导致大量移民族群如拉丁裔、亚裔等难以融入；在同性恋及堕胎问题上，全面放弃基督教价值观，导致作为美国社会根基的家庭风雨飘零。对外，频繁发动战争，输出价值观，导致大量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难民涌入美国，给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失和威胁。新民族主义者还批评保守主义建制派长期故步自封，坚守已经过时的“政治正确”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族主义者对保守主义建制派大加批评的同时，保守主义阵营内部也发出了呼应“积极的民族主义”的声音。保守主义建制派机关刊物《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主张接纳一种切合实际的、稳健的民族主义。其中两位编辑兼专栏作家里奇·劳瑞（Rich Lowry）和拉梅希·彭努鲁（Ramesh Ponnuru）指出：“民族主义可以是一种健康的建设性力量。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持久力，所以明智的办法是培育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试图超越它”。当然，保守主义者也强调，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基于“种族血统”的排斥性的民族主义，更不是那种痴迷于“鲜血和土地”的民族主义，而是基于宪政价值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劳瑞和彭努鲁的结论是：美国保守主义既要承认民族主义，同时又要规制、驯化民族主义；“既要支持心胸开阔的民族主义，又要考虑美国的理想，理性算计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得失”，明智而又温和的民族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理性选择²。他们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保守主义阵营在面对新民族主义挑战时的态度。如此，经过保守主义者的重新阐述，新民族主义顺势成为保守主义联盟中的一员。

面对剧烈的社会改革和变迁，特别是面对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化的历史机遇，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像历史上每次政治和社会转型时期一样，不失时机地跃上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舞台。福音派在延续道德多数派“政治化”路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在美国打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战争”³。政治上他们的主要手段是“使福音派新教徒进入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使他们加入到共和党阵营”、“把保守派人士选进政府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较量中，福音派等

¹ Gary B. Nash, *The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Unruly Birth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2005), 28; xxviii.

² Rich Lowry and Ramesh Ponnuru, “For the Love of Country”, *National Review*, 6 February 2017.

www.nationalreview.com/2021/02/nationalism-conservatism-are-compatible-trump-imperfect-vessel/. 转自万吉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新动向：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1日，第9版。

³ 周濂：“‘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读书》2018年第1期，第23页。

宗教保守力量的关注点已不仅仅限于振兴基督教，而是着眼于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事务进行全面的特性改造，最终使美国回归基督教或重新回到上帝怀抱。因此，福音派阵营并不满足于保守主义建制派提出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成分极为复杂的、高度政治化的宗教与社会保守群体，福音派阵营在具体的奋斗目标上存在很大差异：绝大部分成员的目标在于恢复基督教文化在美国的统治或主导地位，包括以国家法律宣示基督教的特殊地位、在公共场所树立基督教的标识、以及国家资助教会学校及其他相关机构等，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追求一种将美国身份与极端保守的基督教融合在一起的政治神学¹。此外，亨廷顿“盎格鲁-基督教文化”的信奉者则侧重于追逐文化和价值观意义上的基督教美国。上述群体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一般并不公开声称要建立一个白人基督教国家，但当描述基督教美国的理想图景时，往往暴露出“基督教白人民族主义” (White Christian nationalism, WCN) 的叙事逻辑²。在这方面，事实上亨廷顿也难以例外³。相形之下，“另类右翼”关于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的追求则要明确得多，他们直接将美国界定为一个“白人国家”，认为恢复或重建美国国家特性就是要“找回白人美国”⁴。

在2016年那场被认为是“争夺国家发展方向或定义国家特性和认同”的总统大选中，福音派在民族主义化的共和党人支持下，联合了美国社会的各种宗教和文化保守力量、白人优越论者，以及因全球化及国内政策而利益受损的蓝领工人、农民等群体，成功将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在那场选举中，福音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了令人震惊的81%。为了回报这一群体的热忱支持和民族主义化的共和党支持者，入主白宫后的特朗普全面践行福音民族主义：吸纳多名福音派倾向的基督徒及天主教徒担任内阁要职（如副总统彭斯 [Michael R. Pence]；国务卿蓬佩奥 [Michael R. Pompeo]、司法部长巴尔 [William P. Barr]）；颁布“保护宗教自由”的总统令，为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活动松绑⁵；将“圣经学习班”引进白宫；在做出重要决策时，密切咨询福音派领袖的意见；先后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以守护基督教价值观；在白宫宴请百名福音派领袖及其家属，彰显白宫与福音派“一家亲”，等等。特朗普任期届满时，前述福音派领袖葛培理的儿子葛福林（Franklin Graham）深情地赞誉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⁶。

“保护宗教自由”总统令颁行后，特朗普以“宗教自由”为抓手，出台了一系列钳制女权、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法律和行政命令，使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欢欣鼓舞。白宫“圣经学习班”的领班牧师拉尔斐·德罗林格（Ralph Drollinger）宣称“我所有基于《圣经》研究的政策建议和政治主张，都在特朗普那里实现了”⁷。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加紧对移民的管控，明确立法禁止

¹ Andrew Whitehead and Samuel Perry, “The Growing Anti-Democratic Threat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S.,” <https://time.com/6052051/anti-democratic-threat-christian-nationalism/>.

² 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是：美国是由（白人）基督徒（定居者）建立的一个基督教国家；其法律和制度以《圣经》为基础。美国是一个领有天命的国家，其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于上帝。美国同时被赋予了一项使命：传播宗教、自由和文明——必要时通过武力传播。但是随着非白人、非基督徒和非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土地上，这一使命受到了威胁。因此，白人基督徒必须“夺回自己的国家”。参见 Philip Gorski, “White Christian Nationalism: The Deep Story Behind the Capitol Insurrection”, *Berkley Forum* (22 January 2021), <https://berkleycenter.georgetown.edu/responses/white-christian-nationalism-the-deep-story-behind-the-capitol-insurrection>, 12 October 2021 retrieved

³ 亨廷顿关于“定居者”的叙事与 WCN 异曲同工。

⁴ 必要的时候，他们也借助于“文化”或“基督教”这些具有动员效果的词汇。

⁵ 在总统令签署仪式上，特朗普说，“信仰根植于我们国家的历史，它是美国建国的精神和灵魂。我们再也不会允许信仰群体被针对、被欺凌和被禁声的现象出现”。

⁶ John Carter, “Franklin Graham: History Will Remember Trump as One of the Great Presidents of Our Nation” (18 December 2020), www.kwtx.com/2020/12/17/franlin-graham-history-will-remember-trump-as-one-of-the-great-presidents-of-our-nation/.

⁷ 周少青，《白宫出现“圣经学习班”》（2018年4月24日），搜狐新闻网 www.sohu.com/a/229270296_618422。

特定国家的移民入境，并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受到以白人至上主义为底色的本土主义势力的热情赞誉。

对外，特朗普政府公开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并不惜以孤立主义、干涉主义和本土主义等相互冲突的政策和理念为之开道。作为一名被福音派等保守群体抬进白宫的总统，特朗普可谓不负众望。通过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理念，以及基督教保守观念的政治宣示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动员，美国福音派等保守主义由一种宗教保守力量，发展成完整形态的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是美国国家（民族）主义在21世纪的新表现。

四、福音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

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是美国民族国家发展史及国家治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美国自二战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互缠斗、相互支撑的传统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福音民族主义究竟是一个插曲式、过渡性的现象？还是一个从此改变美国政治图景的方向性现象？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回到其缘起的几个重要条件或历史背景中。

第一，福音民族主义是应对外部条件巨变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振，美国陷入内外多重困境。在国内，由于贫富分化加剧，中低层人群的生存状况持续恶化（美国甚至沦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由于种族或族群矛盾叠加“文化战争”，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国际上，由于长期强力推行西方价值观且效果不佳，加之中国、印度等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美国的国家声誉、国际影响力或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传统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无法做出有效应对的历史条件下，混合了保守主义和福音主义要素的福音民族主义走向了历史前台。

第二，福音民族主义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衍生物，具有强烈的策略性和应对现实性。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美国的保守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随历史和社会发展而做出调整。有着“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的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曾提出“民族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三大核心支柱之一”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形势发展使一部分保守主义者认为，有必要适度引进民族主义以矫正和平衡政治和社会生态的失衡。特朗普当选后，以色列圣经学者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和亲以色列的保守主义者大卫·布罗格（David Brog）一致欢呼“保守主义的新生”，他们认为不论是从知识体系还是从政治传统来看，新一轮的保守主义运动正在开启；他们还强调“民族主义不是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而是回归”²。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建制派也积极重新阐释民族主义，以适应保守主义面对的新现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宗教保守派来说，福音民族主义是一种本质性回归；而对保守主义建制派来说，福音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策略性的保守主义。

第三，从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看，福音民族主义也是传统的白人种族主义借基督教的盛装在新时期的一次亮相。众所周知，美国有着深重的种族压迫、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历史。直到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种族隔离违宪之前，美国一直都是一个依靠制度和体制保障白人支配地位的国家³。在种族隔离被宣布为非法之后，那些依旧沉湎于种族优越感的白人开始寻找新的体

¹ 克里斯托提出的另外两个支柱分别是宗教（基督教）和经济增长。Yoram Hazony, David Brog, “The Nationalist Spirit of 2016: A Conservative Spring”, *National Review*, 7 December 2016.

² Yoram Hazony, David Brog, “The Nationalist Spirit of 2016: A Conservative Spring”, *National Review*, 7 December 2016.

³ 内战之前，白人不论是在制度上，还是体制上都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内战之后，由于黑人等有色族裔获得了形式上的公民权，白人转而通过吉姆·克劳法来延续自己的种族特权。在此过程中，南方的福音派领袖不惜以上帝或圣经信条来为这种系统的种族隔离提供合法性论证。

制或制度依托，而基督教及宪法保障下的“宗教自由”成为一个极为理想的替代品¹。可以说，尽管在纯粹的宗教意义上，包括福音派在内的基督教是一个绝对超越种族或族裔边界的普适性宗教，但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深受特朗普主义影响的当下，福音主义或者福音民族主义都是白人种族主义者或白人优越论者的重要栖息场所或载体。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当选总统的第二天，包括许多福音派在内右翼人士欢呼“特朗普带来的民族主义”，并认为“这是美国白人的胜利”²。

第四，从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两分的视角来看，任何迄今为止配得上“现代国家”称呼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两种价值取向。在国家处于进步或上升时期时，其公民民族主义的色彩往往相对鲜明，反之则族裔民族主义氛围相对浓厚。美国也是如此。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缺乏西欧民族国家那种传统的、连续性的族裔基础。当国家处于进步或上升时期，其公民民族主义的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至少是在法律文本层面）；当国家相对下行又或处于危机或挫折时，族裔民族主义的一面就开始显现——由于历史的、宗教（文化）的及政治（特别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表达美国族裔民族主义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群体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把美国还给上帝：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的作者安德鲁·怀特海德（Andrew Whitehead）和塞缪尔·佩里（Samuel Perry）把基督教白人民族主义同时称作“族裔基督教主义”（ethnic Christianism）的重要原因之一³。

第五，从现代性视角来看，福音民族主义的登台也是美国现代性危机的一次预演。第一次大觉醒所宣扬的对上帝的虔敬前提下的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破除了僵化的、体制化基督教藩篱，为美国的破土而出及其后两百多年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此过程中，获得解放和个性伸展的新教徒并不总是按照上帝所赋予的“理性”去思考、行动和认知基督教，而是日益走上了世俗主义、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甚至无神论（据调查，全美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绝对自由、平等主义之风日益蔓延——同性恋平权直至同性恋婚姻完全合法化、女权主义乃至堕胎完全自由以及传统家庭伦理和价值观的蜕变，加上以丧失生活的方向感、价值感和意义感为标识的颓废主义的兴起，等等，导致几乎占总人口一半的福音派及其他基督教保守群体、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甚至伊斯兰教徒中保守群体的强烈不满。这一切再叠加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宗教信仰的普罗大众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在遭受的危机。

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福音派走到了历史前台。尽管这一时期的福音派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引领主流政治社会文化、时刻矫正国家方向、充满着世俗主义精神的宗教，但它仍然代表了“基督教美国”的传统属性，代表了美国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属灵的内在”。如论者所言，福音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反映的是美国乃至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一场生存危机”，“它最深刻的地方是期待一场灵魂救赎，从而将西方从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的精神荒漠中拯救出来，从资本主义的平庸生活中拯救出来，从历史终结的‘末人’世代中拯救出来”⁴。在这个意义上，福音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美国精神救赎”的一面。

以上笔者从“应对美国内外部条件巨变”、“传统保守主义策略调整”、“白人种族主义的复兴”、“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互搏”以及“美国现代性危机”五个维度纲要性地分析了福音民族主义崛起的条件或历史背景。如果可以把前两个维度粗略地归类为“条件与策略”，后三个维度大致划归为“认同与终极信仰”的话，那么福音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则可以大致研判如

¹ 在 2016 年竞选期间及随后特朗普的执政过程中，“宗教自由”成为那些用福音外衣包裹着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非常称心、得力的工具话语。

² 周濂：“‘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读书》2018 年第 1 期，第 20 页。

³ Andrew Whitehead and Samuel Perry, “The Growing Anti-Democratic Threat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S.”, <https://time.com/6052051/anti-democratic-threat-christian-nationalism/>.

⁴ 孔元：“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1 期，页 132。

下：一方面，随着美国面临的内外矛盾的相对缓和及保守主义策略的相应调整，特别是随着公民民族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福音民族主义的动能将进一步减弱（2020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败选是标志之一）。另一方面，从“认同与终极信仰”的视角来看，尽管随着美国内外部条件的舒缓，以“文化战争”为表征的认同问题会相对纾解，但作为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与信仰支撑的“基督教国家”，福音民族主义仍将具备十足韧性。在可见的未来，尽管福音民族主义的“领头羊”福音派面临着人口下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年轻人的退出）、内部冲突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它作为美国基督教社会的中枢和传统价值的积极捍卫者，仍将是福音民族主义的中坚和旗手。福音民族主义也将继续在美国内政和外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网络文章】

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¹

——对中国与东南亚间国际关系的文化史思考

王赓武²

一、引言

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感到年纪大了的缘故，反思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长在马来西亚，当时是英属马来半岛，里面有不同的王国。我长大的地方叫霹雳洲，当时是叫霹雳王国，王国信奉的宗教是伊斯兰教，霹雳王国里华人的数量大约占到三分之一。我出生的地方叫怡保，是一个华人的聚居区，多数人来自中国的华南，主要是客家人，当地的生计方式是开采锡矿，锡矿的发展特别成功。我中学毕业之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即今天的南京大学）去读书。当我上到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国共第二次内战打到了长江，南京的学校因为担心战火而关闭，我就回到了马来。马来在二战之后，随着英国势力的渐渐退出，成为马来亚联合邦。联合邦一共九个小王国，再加上檳城和马六甲，就成为马来亚联邦。本来新加坡是属于这一个系统的，曾经都是英国人管理的殖民地，但是英国人跟马来方面谈判的时候，因为顾及到新加坡的华人太多，加入后会使得非马来族群人数超过国民人数半数，马来方面不希望新加坡加入到马来亚联邦。因此后来马来方面就跟新加坡分开了，但是我回到马来来的时候情况还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我重新上的大学是在新加坡建的马来亚大学，是现在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前身。结束在那里的深造之后，接着到英国继续学业。

我想回述这段历史，一个主要原因是每当我想起那段时期，总会有一个感觉，跟今天的题目有些关系。各方面不同的政体，不同的历史经验，每个人都会有所经历。比如像我，出生的地方

¹ 本文为王赓武先生2014年11月8日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所作讲座整理稿。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承办，得到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资助。承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卞恒沁同学提供讲座速记稿，王钊同学提供现场录音，特此一并致谢。
https://mp.weixin.qq.com/s/oJAzcfT_nBWCPUUzmqFOeg (2021-12-11)

² 王赓武先生祖籍河北正定，1930年出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泗水。1955年获马来亚大学（今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起任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1994年荣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目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先生于2007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为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与教育家。

当时是叫东印度，长大后这地方是英属的马来半岛。到了1941年的年底，日本军队打到东南亚的时候，我有三年零八个月是在日本实际控制的领土上生活着的。后来日本被打败了，英国的势力又回来了，不过英国人回来后的情况已经跟二战前大不相同。英国势力回到马来亚，面对着许多反抗集团，有马来亚共产党，也有其他马来民族的国民党，当时各种党派之争，夺权、斗争进行的非常激烈。这段历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要重视在一个区域的整体视野之下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有各自退让的时候，也有很多时候出现强进的情况。各种进退使我有了一种深远的感受。想象这段历史，联系到整个东南亚历史，以及中国和东南亚相互交流的关系史，强进与退让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考虑。

二、历史上的进退：东南亚与中国

既然我是结合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起进退的概念，想起东南亚历史中进与退的变化，想起中国内部进与退的变化，想起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进与退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都值得考虑。不过，因为我是在东南亚地区长大的，因此我最好还是从东南亚的情况说起。

（一）东南亚：内生的进退

东南亚这个地区非常有意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从地理上看，整个东南亚大概三分之一是大陆，三分之二是岛屿。岛屿分为五个国家，大陆也是五个国家，现在一共是十个国家。东南亚这个名称本来是历史上没有的，这个名称是源自二战时期，英国人把东南亚作为这个地区的战区代号，才有这个名字。之后国际上人们普遍使用成为习惯，就在观念中成为东南亚这个新的区域，因此东南亚是在二战之后才有的地理区域概念。二战之后的情况依然非常复杂。大陆上有越南、泰国、缅甸三个大国，还有柬埔寨和老挝两个小国。各个国家当中生活的族群情况相当复杂。既有处在比较文明阶段的民族，同时也存在相对显得原始一点的民族，同样的，既有现在的土著民族，也有许多外来的民族。

但是现在很多所谓的土著民族不一定是土著，以前的土著民族跟现在的土著民族可能是不同的。东南亚地区比较早的族群，可能是现在柬埔寨人的祖先，我们知道的他们在东南亚大陆长久居住的历史，都是在一两千年之前的事情。而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是跟随藏族从中国云南进入缅甸的，泰国的主体民族也是由从中国的广西、贵州那边迁入的傣族后来经过历史变迁、文化融合演变而成现在的泰族的。中国的秦汉朝代都征伐到过越南，在越南南部还设立了三个郡，这都是当时秦汉的郡县，直到唐朝1000年间都是以汉人为主。越南人的本族跟中国华南古代的越族，在语言与风俗习惯上有着共同的方面，现在我们的历史学家已经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越南人不停地南进，强进到南方，攻下占城。占城现在是越南的中部地区，原来的民族跟马来族一样，跟大陆的民族没多大关系，他们是从海上迁到占城去的。越南的南部原来属于柬埔寨的土著民族帝国的版图。随着越南不停地朝南走，占领占城，强进到柬埔寨帝国的南部，留下了原先帝国的小部分区域，即现在柬埔寨国家的版图。同时傣族也就是现在的泰族，从广西贵州那边南移，渐渐把现在的泰国地域给占领了。历史上东南亚还有一个孟族存在，现在的人数已经很少了，孟族原先生活的地区是现在越南的南部与老挝的一部分，结果被缅族与傣族这两个大民族占据了，孟族历史统治过的地域基本上完全属于缅甸了。这是大陆强进，从北到南的政治力量运行的结果。

海上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马来这个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我们现在讲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叫做马来人，印尼其实也有马来人，但是很少，根据最近的人口统计，印尼的马来人只占整个国民人口的4%。我们都很惊奇，因为他们的语言和马来语一样。印尼的国语属于印尼文，跟马来西亚的国语是一样的，多少有一点不同。这些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以前的历史资料里都叫马来族，来源不清楚，名称也不清楚。总之这些民族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历史早期他们都受印度影响，信

奉印度教，但是他们来自于什么地方，到现在学界还有争论。最初研究他们的学者认为，马来人也是从中国云南和广西那边迁移过去的，来到东南亚的时间比其他族群来的都更早。后来研究的专家说不对，现在一般大家可以接受的说法是，马来族是出自中国华南，经台湾到菲律宾，从那边移到南方所有的岛屿上，一个结果是语言学者发现岛屿上这些民族讲的语言，都有相当的关联。如果这些认识是对的话，那么从中国华南到台湾，从台湾再到菲律宾，再从菲律宾分散到很远的地方，整个东南亚所有的海岛，都是马来族生活的地方，一直到马来半岛。还有的观点认为这些族群甚至去到更远的地方，他们的足迹延伸到南太平洋，直到新西兰，都是从马来族分散出来的族群。马来族的分布非常广，基本上他们都是海洋人。出海对他们而言是很自然的事情，经济上有需要的话，或者碰到灾难的话，他们上船就远去了。

（二）中国：北进南退

下面谈谈中国方面的情况。秦汉以前什么是中国也是个问题。到了东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后人认识的中国版图扩展至楚国和吴越、进入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境外就是百越，现在我们叫做华南的区域，以前这些区域都是越族的地方。汉人也是从北方南进，分了好几次的南进，才形成今天的国家版图。秦汉时期边界向南走的最远的时候是，秦国一直打到现在的越南中部，也就是过去的象郡。在南方其他地方，存在闽越、南越诸国，秦汉之后只有一个南越国，后来汉武帝削藩，把南越国变成为一个郡县，之后汉朝就不停地南移，渐渐地把华人所有的地方都汉化了。有些南方人到现在为止，都自称为唐人，不叫汉人，说明这个群体在唐朝的时候才被中原汉化的。

到沿海地方去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海洋的问题是怎样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大概秦汉时期从北方来的人，对海洋并不感兴趣，见到了大海就满足了，就不再朝南走了。百越之中有一部分人群是在海洋上生活的，比较熟悉海洋生活，这些人在历史上到底怎么样，我们并不清楚，也没有记录。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有一部分被驱赶着不停朝南迁移，其中一部分去了台湾或者菲律宾成为马来人的一部分，也有一些人可能迁移到占城、到马来半岛，其余的留在华南被汉化，过了好几代之后，就成为后来的唐人。

不过对于这段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疑问，不太清楚。总之到了唐朝的时候，所有的南方之地，都成为中国人的地方，连越南也算是中国的地方。当然那时候这些地方之间是有所区别的，现在属于广东、广西这些省市，当时都隶属于郡县制度，但是越南则不叫省，因为还没有完全被汉化，汉人和土著之间，还带有一种殖民地的性质。到唐末宋初的时候，越南人在中原的王朝国家陷入战乱的时候，或者分裂难以统一的时候，乘机建立了他们独立的国家。

宋代国家势力的孱弱，造成北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北宋没办法控制越南，越南渐渐建立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国家，与中国渐渐演变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所谓东南亚和中国的分别，这条边界，就是现在的中越边界，这个边界在过去的一千年间都没有变过。在亚洲的历史里，边界能够维持那么长，这是唯一的一个。也许在生活于山区的民族之间，实际边界有过一点小的变动，但是大体情况上中国和越南间的边界没有变化。可以说现在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边界都是新的，但是这个千年前形成的边界，即中国和东南亚的边界，从五代时期就开始没有变过了。

到了秦汉两代之后，中国南移的趋势是中原的王朝见到了海洋，就不再南进了，之后的历程依靠商人在海上经商。这些人基本上都来自华南两省，即广东和福建，而且出海、下海的这些人是很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当中胆量最大的闽南人。历史上，闽南的海商发展最为成功，很早就有泉州港，后来泉州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国际性海港。在五代十国的闽国时期，泉州就变成一个很有用的海港，渐渐地发展到宋朝就更加不得了，到了元朝的时候，更是成为中国最大的海港，比广州还要重要。这当然跟南宋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南宋的首都在杭州，泉州靠得比较近，泉州到杭州之间的海路运输非常方便。随着自身商业贸易的发展，泉州到了元朝的时候也是主要的海港。

汉武帝之后，中国的海上强进就没有什么进展，基本上是靠商人贸易，包括外国商人到中国来，也包括中国商人到外国去。当时商人的数量非常少，外来的商人比中国的商人数量多，其中主要是马来族的商人比较多。东南亚最富有的一个小国占城，地处今天越南中部，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成为当时所有经商者的必经之地：去东南亚的商人都会途经这里，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商人也要经过这里到中国去。占城建城非常早，但是在商业上经营占城的人并不是当地的原住民，而是马来族，他们占领了占城，把占城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海港，分别与中国和印度洋边的国家做生意。中国的商人跟占城的关系特别密切，我们在宋代就可以发现，闽南人和占城人之间的生意往来非常频繁，也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海南得到开发。海南岛的开发者就是闽南人，经过大陆沿海海运到占城去的这条海上商道，对于海南的开发应该说是起到了作用。

我们稍稍总结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南进的这条路，到了海洋就停止，基本上停滞了一千多年。在大陆上也出现了变化的趋势，因为越南独立之后，就限制了中国在大陆南进的发展。回顾中国到南方去的总的历史趋势，第一个时期就是从秦汉到唐宋，基本上是强进到华南，把整个华南汉化，变成中国的地方，但是没有到别的地方去。第二个时期是强进至云南的时期，岭南之后就是云南。云南地区本来就存有汉化的影响，云南有一些民族渐渐地经历着汉化的过程，比如可能是最早受到中原王朝影响的大理国，受了很多唐朝的影响。以前这个地方有南诏国，但是他们的汉化程度不及大理国那么深。而且大理国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属于中原王朝。元朝蒙古打南宋的时候，它从四川的西部，攻下大理国，再从大理国绕到南方，经过云南贵州，把南宋的南边攻下，使得南宋难以同时应付，最后两面受敌，失败亡国，整个中国就被蒙古族统治了。在那个时期，云南省是元朝的一部分，随着明朝把云南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之后就成为明朝的一个省。因此我们看到，云南成为中国的南方，境外之地变成境内之地，这是五六百年前的事情。第三个时期是明清以来，属于西部、但是也是在南方的范畴内，云南以西，就是西藏的问题。西藏现在的边界也是中国向南方进展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形成印度和中国的边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向南强进的时期，其中还有许多需要扩展的有待研究的新问题。

（三）进退的动力：从宗教到文化

从岭南跳出来，我下面要讲讲云南跟东南亚的关系，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云南平定之后，大陆的情况有所改变。关于云南一段的边界问题，中间涉及到云南和傣族之间的边界、中国主体民族和傣族的关系，这些边界的问题经过明朝、清朝之间几百年不停的争论，直到后来才解决，直到三四十年前慢慢地才真正把边界问题搞清楚。而缅甸跟中国之间，以前也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边界。这个问题从英国在缅甸的时期开始讨论，也是到20世纪50年代最后才划清楚的。东南亚地区明确划定的边界，第一段就是中越之间，其余的都很晚，都是在近50年才把边界划清楚的。历史上中国跟东南亚关系，基本上都是围绕贸易展开。生活在中国和东南亚边界地带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面对的是怎么在边界中生存、妥协、避免汉化的问题，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

华商从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就开始跟东南亚各国家的港口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起初的人数不多，但是到南宋时人越来越多。现在如果比较的话，中国人进入东南亚地区的时间并不是很早的，进入当地最早的应该是印度人，因为印度人跟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可能两三千年前已经开始了。与印度人的贸易关系对整个东南亚的宗教文化、文字语言都造成了很深的影响，整个马来半岛的宗教都是来自印度的宗教，比如佛教，是当时印度的佛教，不是中国化之后的佛教。印度教在东南亚最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印度教已经深入到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影响连同整个马来半岛。一直到15世纪、16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进入才慢慢地在马来之间代替了印度的宗教，整个的变化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印度的宗教会退出，让全部的马来地区都改信了伊斯兰教，文化变动如此之大，而且影响深远，这个过程很值得我们考虑。历史上发生的进和退的过程都很有意思，印度教一直在退缩，现在只有印尼的巴厘岛有印度教，巴厘岛的印度教相当纯粹，但是已经掺杂了本地东南亚文

化的不少成分，总之印度教一直退缩到巴厘岛，其余的马来地区都成为伊斯兰教的地盘了。而且这种进退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依靠战争，不像现在，一谈起伊斯兰教就要联想到武力。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化完全是和平的，是一个一个的王国属地，从信仰印度教，转到信仰伊斯兰教，一直到最后所有的马来王族的国家都成为伊斯兰教的国家文化渐进过程。

印尼成为全世界伊斯兰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走完这个过程不过是四百年。13世纪的时候，苏门答腊岛北部已经有少数的伊斯兰教徒。这些教徒可能是早年定居于此的印度人。因为印度在东南亚的影响非常早，影响相当大。印度本身也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从波斯湾红海一带的阿拉伯半岛出来，虽然人口很少，但是通过经商，他们同时把自己的宗教带过来，渐渐地影响到当地的国王，慢慢地使得他们也改信伊斯兰教，这是好几百年的历史。13世纪的伊斯兰教徒，在东南亚成立一个小据点，从13世纪慢慢地走到15世纪的马六甲王国，跟中国发生了联系。郑和帮助建立的马六甲王国，从本来信奉的印度教，改信到伊斯兰教。之后马六甲王国把伊斯兰教渐渐地传到其他的马来族群去。从郑和起，到18世纪的时候，整个马来群岛，除了巴厘岛外，都是伊斯兰教的地盘。

中国方面对于东南亚的影响相对有限，基本上是贸易关系，文化方面除了越南，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影响。越南是汉化程度比较高的，尽管保存有儒家的因素，但后来也信了佛教。但是对于其他的地方，印度的影响则非常大，程度最大的是在海岛之间的各马来民族，也包括大陆的孟族、緬族与傣族。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是从印度传去的，而是从锡兰去的，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这是一段小插曲。印度本地的佛教被渐渐地消灭掉了，都成为了印度教，佛教余下的力量被赶到斯里兰卡去。斯里兰卡的传教士把他们的佛教带到缅甸和泰国，本来缅甸、泰国可能也是印度教影响相当大的区域。后来斯里兰卡的佛教，传到了泰国、缅甸和老挝，一直传到云南。所以云南的佛教来自两部分影响，一部分是从中国内地来的，一部分是从缅甸和泰国过去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到了缅甸和泰国，因此缅甸、泰国、柬埔寨这些国家原有的印度教没有被改信伊斯兰教，而是改信了斯里兰卡的佛教。

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的历史，是许多外来的强进势力，比如宗教的，渐渐征服当地土著的历史，我们要考虑的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势力的影响形成了复杂的东南亚区域。

不同于宗教的影响，华人在这个地方主要是从事经商，人数并不多，因此并没有深刻影响到当地的文化，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非常活跃，连同印度洋上来的商人，这些势力在不停地扩张。一直到16世纪，靠商人建立和维持的贸易、经济上的关系非常稳定，非常和平，除了小规模的贸易上的争执，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当时海洋上也有以苏门答腊岛、马六甲海峡为主要范围的国家，后来爪哇又建立了一个以海洋为主的帝国。但是无所谓什么帝国，也没有什么显赫的海军力量。海洋上的商人被不同政治的势力利用，为他们经商。从材料上看，没有什么强大的海军势力爆发海洋上的战争，这一点完全与西方的历史不同。

三、现代性的进与退：东方与西方

（一）外来者：西方的进入

我们最后谈的是16世纪之后进入东南亚的来自西欧的势力，相比之前影响东南亚的势力，他们来自非常远的地方。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西欧建立海洋势力是因为自身在欧洲地中海贸易争夺上的失败，伊斯兰教限制住了他们贸易的范围和经济力量，几次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失败了。因此整个东亚、南亚，以及其他富有、文明的国家，跟西欧都断绝了关系，东西之间都是伊斯兰教的势力，整个中亚、西亚、中东、北非，一直到欧洲的南部、东南部都是由伊斯兰教控制。西欧的地方，被异文化势力隔开，没有办法跟其他地方展开贸易，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马可波罗，他之后的欧洲人都不能到中国来了，因为传统商道都被伊斯兰教挡住了。

因此西欧人只能从海洋上想办法。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葡萄牙，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不过100万人口，当时福建已经200万人口了。葡萄牙人航海远洋到印度洋、到东南亚来，它的邻国西班牙派哥伦布到美洲，派麦哲伦航行太平洋。正是这两个小国家，一起带领着整个西欧势力在海上的发展，海洋的历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对比来看，福建当时200万人，有相当重视海上贸易的传统，本来是有条件出海的，中国海军也很有力量。但是因为中国自己在海上退缩了，所以明朝郑和之后，就没有在海上发挥过任何作用。闽南人中在海上经商的人非常有经验，他们凭借海洋做生意根本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明朝郑和以后的政策把他们限制住了，不让他们出去，根本不能跟外国经商，而是靠外国人到中国来，用朝贡制度，到中国来经商，不许中国商人大量的出去，限制得很严格，要出去的话，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手续才行，人数就越来越少了。在同一个时期，西欧就开始发展他们的海洋历史，他们原本在海洋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比如欧洲文明的发端，就离不开海洋战争，最早的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就是海洋战争，最重要的战役也是在地中海上打的。现在我们看着地中海觉得很小，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地中海是很大的一片海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海战是很了不起的战争。罗马打希腊、埃及、中东好多国家，也是依靠海战。他们能从欧洲打到北非，也是因为有着海上的势力。

西方人对于与海洋有关的海军、海战的概念很早就有。对比来看，中国反而没有这个传统。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对海洋就不感兴趣。五代十国中的闽国因为自身条件，开始要依靠海洋贸易，才建立海运，南宋也是有偏安江南的理由。明朝相对特殊，到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真的是有了海军的规模了，但结果是因为各种理由也退出了，抛弃了整个海洋的活动。与此同时西方是相反的历史进程，最后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都控制了。中国的华商因为没有海军的依靠，最后不能与西方的贸易规模相比。就连伊斯兰教、印度教控制海上的势力，后来也被西方的商人打败了。最后的结果是从红海、波斯湾、南中国海一直到澳门，基本上所有的港口都是由西方的海军占据的。

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兴起的荷兰，他们拥有当时最为新式的海军，现在我们看荷兰是非常小的国家，但是当时他们的海军是非常了不起的。最早在海上能打仗的军舰是属于荷兰的海军，英国人也是因为打败荷兰才发迹成为世界帝国的。总之，这两个国家的海军势力扩张到了东南亚来。他们双方都是想和中国做生意，但是中国不开门欢迎他们来。因为当时的朝贡制度是那么的严格，不让他们进来，只开了一个小口：让葡萄牙人在澳门，这么一个小地方。所有外来的西方商人，都要经过澳门，等于贸易的中转完全由葡萄牙人控制。英国人和荷兰人非常懊恼，想尽各种方法跟中国经商，都没有成功，明朝、清朝都是如此。尽管后来有了广东十三行的生意人，经过澳门，跟西方人做一点小规模的小生意，但是总体还是限制得很厉害。

（二）中间人：华商的崛起

但是这个时期华商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尽管早年受明清海禁政策的影响，从商人数有限。我认为人数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点是，西方人进入东南亚之后，非常欢迎华商到他们的殖民地地方去，帮他们去跟中国做生意，尤其，比如当时的西班牙人就欢迎闽南的商人到吕宋去，就是现在的菲律宾，帮助当地建立与中国的贸易联系，荷兰人非常欢迎他们到爪哇来，后来的英国人也是以同样的理由来欢迎他们。当然这个历史进程里面有矛盾，一面是明清政府严格地限制到海外去经商，另一面是经商的人数越来越多，华商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第二点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闽南的华商借中原陷入战乱的机会，建立了许多商团，由郑成功集团领导，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海军，华商的海军最后变成了反清的势力，后来占领了台湾。郑成功闽南这个集团，建立了一个海上的新势力，因为有这个保护的基础，闽南商人经过台湾，跟东南亚开始经商，建立了特别的关系，之后经商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虽然清朝同样执行海禁，同样限制华商出去经商，但是清朝也知道，这个势力太大了，而且利用好他们对于朝廷也有很多好处，商人也可以带来很

多外来贸易的好处，因此限制也渐渐地放松了一点，于是经商的人数就增加了。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外来的压力，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

因此从 17 世纪开始，华商到东南亚去的人数越来越多，18 世纪人数规模在当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就 18 世纪看的话，整个东南亚所有的港口，都有华人的团体，有些地方人数还很多，比如菲律宾的马尼拉，荷兰治下的巴达维亚，即现在印尼的雅加达以及马六甲。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利用华商，在所有的港口跟本地的居民做生意，把他们所有的物产带到上述地方去。西方人就是经过这样的流程，由华商把东南亚各地的物产到他们的殖民地，再经过他们的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通商。在这种情况下，华人的角色显得有点复杂，从西方帝国主义政府的角度来说，华商非常有用，他们可以利用华商跟中国经商，所以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但并不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力量，仅仅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另外从东南亚当地土著的视点来看，中国人地位比他们高，因为这些殖民地政府，欢迎华商、利用华商，看不起当地的居民。这样就在东南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建立了一种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华商要跟本地居民往来经商，而且依靠他们的土产来做生意，同时华商也要常常进入西方世界，要跟他们的官员交涉，以保证维持他们的现有地位，以及与西方世界特殊的关系，这两方面都要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华商到现在为止在东南亚的地位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就是因为这个群体在历史上的角色就站在中间人的位置。中间人的角色很难做，外面对他们未必信任，里面的又恨他们，这些深厚的矛盾，演绎了近代几百年的故事。

说到这一点就必须谈谈现在，因为许多问题都影响到现代。到二战之后，你们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帝国主义退出之后，所有东南亚的国家一个一个都得到独立，建立他们的新型国家，在建国的过程中，所谓民族、所谓国籍、所谓谁是当地的居民的权利，这些问题都越来越严重。因此大量华人，包括华商与华工，在这些新型国家的地位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中国大陆解放之后，也考虑到这些问题。其实在中华民国时期，国家也面对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从对于东南亚华人的名称上的改变就能看出一点端倪。原本最初称呼海外华人的名称是华商、华工之类，后来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国家开始重视海外华人，因为华人一方面支持清朝当时新政时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所以把华人看得非常重要，就把他们叫作华侨。华侨这个概念的意涵就是你们都是中国人，只是暂时住在海外，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要效忠中国。这种概念的意涵之前是没有的，在海外做生意意味着国家是不管他们的。但是 19 世纪末的时候，清朝改变了政策，朝廷知道华人在海外经商很成功，可以帮助他们，因此鼓励华人认同清朝；中华民国从孙中山起同样希望华人认同中国，重新回到中国怀抱。

所以说，国籍概念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从前没有什么国籍概念，国籍的概念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国家为了整合与发展利用的西方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国籍。在清朝跟英国签的《南京条约》里，明确允许英国人能够在上海等中国港口长久地居住，到了《北京条约》之后，更是允许他们到中国内部去生活去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条约里说明了，外国人有侨居的资格。外国人能在中国侨居，那么相对的，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外国人的地方，也是侨居。所以所有的本来没有国籍概念的海外华人，他们不是明朝的移民就是清朝的臣民，现在都变成了侨居他乡的华侨。虽然很多华侨在外国生活了好多代，生活方式根本就是外国人的模样了，但是因为还是和中国做生意的缘故，保留了他们中国人的身份，但是实际中他们是无所谓国籍的。不过那个时候，既然中国政府承认他们是华侨，那么大家也都默许了自己的中国国籍。

但是在二战之后，这个问题就显得严重了，像东南亚这些地方的新兴国家会说，我们现建立了新的国家，那么你们这些华人到底是什么国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这时也是很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尤其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这涉及到中国跟东南亚这些国家怎样建交，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冷战的情况下，反共的势力同样在东南亚也很活跃，让东南亚的国家去反共；而东南亚的各个地方也都有当地的共产党，共产党也要去支持他们，怎么样支持他们，也

是一个问题。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万隆会议就借机召开了。周恩来总理宣布说，当地的华人可以选择当中国侨民，对于回国表示非常的欢迎；如果华人要留下，那就是中国的侨民，一定要守当地的法律；同时华人也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国籍，加入了之后，就是当地的国民。对当时的华侨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年轻的一代，反而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既然不要回中国去，就要在当地生活下来，加入当地的国籍，很多人都认为很自然。但是有些老一辈的人，感到非常的伤心，就感觉好像中国把他们放弃了一样，不保护他们了，他们认为自己失去了与中国的联系。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国方面有所改变，东南亚方面也有所改变，因此关于华人的地位，华人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那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有很多当地年轻的中学生认同中国，而不认同当地的政权，不入籍，就回到中国来了。也有一些人想在当地生活，在当地的政治中表现得很活跃。因为冷战关系，亲共与反共的势力都不断出现，可见那个是非常困苦的时代。从华侨要成为当地入籍的华裔，这需要一个过渡期，需要考虑的影响很多。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困难，中国也面临了很多问题。从外面看，中国国内情况也比较混乱，从大跃进到大革命，使得许多海外的华人不敢也不能回来。在那种情况下，有一些华人不得已选择了入籍。当时在东南亚那些地方入籍也非常困难，当地的人并不欢迎他们，给他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使得他们非常的艰苦。华人身份变化的总的趋势很明显，从华商、华工，到华侨，再从华侨到华人、华裔。

四、当代国际关系的进与退：中国与世界

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到底中国跟这些新兴国家的关系如何？这些国家对中国又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崛起了，是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现在还在了解这个问题，而东南亚各国家也要考虑如何跟中国建立新的关系。

（一）崛起的中国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亚洲唯一的大强国，自汉唐以来，历经明清。但是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再到二战后，中国却成为了一个非常衰弱的国家，被各个西方国家欺负了不知道多少次，跟日本也打了那么多年，非常弱小贫穷，而且近代中华民国时期，因为内战导致国家分裂地那么厉害，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力。那时候海外的华人靠不了中国，要靠自己生存，靠自己应付当地不同的情况。虽然说是中国人，但是中国没办法保护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活动。这一百多年里，外面的势力，不管是亚洲的、欧洲的、美洲的、还是东南亚的国家，总之已经习惯了这个概念，就是中国是个衰弱的、没有力量的国家。现在中国崛起了，这就成了一个很新的观念。

过去的中国那么强大，根本对东南亚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什么来往，来往的非常有限；现在中国的崛起，反倒跟东南亚的关系变得很特殊了，非常重要。重要的理由当然有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崛起和中国这 30 年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经济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势力，从前没有什么全球化的经济，传统社会都靠的是契约形态的经济，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是一个自足的国家，没有什么贸易、外贸，一直到清朝末年也是如此。

现在不同，现在的经济发展是靠全球化，中国 30 多年的发展靠外贸、出口。外资投入到中国的工业中，通过中国加工生产出口到全世界，因此贸易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且除了市场之外，资源也要从外国运过来，石油是最明显的，其他资源也是靠从外国运过来的。运输途径主要依靠海运。我们要注意到全球化是靠海洋来开展贸易的，海洋和全球贸易分不开。没有海洋上的发展，就没有全球化，这一点是可以从很绝对的意义上说的。因此现在的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到海洋的问题。几千年前中国对海洋的态度是可有可无的，基本不重要，现在则变得十分的重要，

需要重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跟海洋、全球化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海洋经济，主要涉及到的的是东海和南中国海，因此这两片海域就变得非常重要。

历史上，中国的海军势力自郑和以后，没有什么发展。开始发展是在清朝末年，经左宗棠在福州主持造船厂、培训海员才正式开始。回顾当时海上的势力，英国拥有规模最大的海军，英国培训了日本的海军，因此在亚洲，日本的海军是最强的。后来继承英国势力的，就是美国的海军，也是由英国培训的，出自一个系统。因为美国的经济力量的崛起，他们超过了英国，继承了英国海军的势力范围，这是后来的事情。当19世纪中国想建立海军的时候，面对的情况很困难。找英国人来帮自己建立中国的海军，英国人不肯，英国人觉得中国过去是个大强国，不能把他们海军建得太好，就去帮日本，因为日本是小国。中国的海军建设基本上是靠法国，但是法国的海军实力不如英国。到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海军之强，完全得益于英国的培训，中国不如他们。甲午之战失败虽然还有其他的理由，但是主要的一点，还是日本海军是英国人在亚洲培训出来的，中国没有那样的基础。在第一次跟法国打的时候，法国本来是培训中国的，结果跟法国打起来了，那是1885年，中国海军没有打败法国的海军。到了甲午的时候，就更不行了，打不过日本。从甲午之战一直到1949年解放，中国有什么海军呢？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没有办法建立海军，根本没有这个力量，因为从民国开始就军阀混战。民国建立之后，南京政府成立也没有这个力量，不停地在打内战，打日本，根本没有机会发展海军。虽然有了几条船，都是买的别人的，培训的人员也少的可怜。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解放中国，建立人民政府，没有靠海军，都是陆军一路打下来的。我那时在南京，记得解放军到长江，要过江都需要克服一些问题。因为没有海军，连船都没有，都是靠当地的一些小船，当时连过江的问题都很困难。后来我才知道，中国解放军的海军是1948年在泰州建立的。在那里，人民解放军是因为需要过江，才开始着手建立海军。当时海军没有船，没有所谓海军的人员，没有专门懂得海军的人，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培训人才。解放军的第一艘海军军舰，是从国民党那边投降过来的。那时谈不上中国拥有海军，中国还没有办法好好地建立海军。当时还有一个外部条件。在冷战时期，40年代全世界的海军，都在反共国家的手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有海军的国家只有苏联。但是苏联的海军实力也极有限，比起其他国家的海军，苏联的海军很可怜，黑海受到土耳其、希腊的限制，波罗的海受瑞典、英国的限制，根本打不出去，唯有一个港口在东部海参崴，剩下都是在北极。所以俄国无法建立起实力了不起的海军。历史上，俄国就面对来自海军的问题，日俄战争的时候，俄国的海军在东海就全部覆灭了。

中国解放之后，海军从哪来呢？没有办法培训，所有的海军都是反共的，这是背景。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注意到邓小平也没有讲要建立海军，对海军的问题没有多谈。那时候在军队方面不多谈，基本上谈的就是要发展经济。各方面是在有了现代化之后慢慢来。也许不一定对，但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中国重视海军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苏联垮台之后冷战结束，中国开始认真地考虑建造大量的船只，建立一个相当好的海军的目标，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经历20多年发展的海军，跟英美国苦心经营了三四百年的海军势力相比较，肯定不一样。英美国家海军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在海上的势力不容小视。

这里面也有具体国情的原因。中国三分之二的边界是在陆地，三分之一才是沿海的港口。因此中国的军力，三分之二的精力还要考虑到大陆边界的国防问题。可以说，中国国防三分之一的考虑是在海上，三分之二是针对大陆。美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大陆上没有敌人，南边的墨西哥和北边的加拿大根本不成问题。他要照顾的是东西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所以海军势力对美国而言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全部精力都用在海上，当然天空上也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就海陆方面的军事注意力投入来比较，美国全部精力还是在海上，是一个海上的势力。而中国的国防军事只有三分之一的考虑是海洋的问题。

当然就像我之前讲的，现在全球化的问题不仅是国防的问题，还有经济的、贸易的问题。因此海洋的运输，以及海运的重要性国家必须很清楚。自己国家海洋的海线要保护，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中国也有两个海的问题：东海与南海。东海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中国和日本的两国关系，但是南海则涉及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其中还有许多问题。

最新的变化是出在内部，东南亚本身的性质改变了，跟历史上情况完全不同。从前是一片大陆地区：马来半岛、一个海洋：南中国海，上面分布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宗教性质，彼此不同，而且完全不合作、不来往。简单商业上有一些少少的贸易关系，但是政治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往，整个东南亚没有形成一个集团能够对抗外来的势力，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十个新兴国家，其中两三个是比较强大的，印尼将来可能是个大国，现在大概也是，但是它将来的势力将会更大。越南也有相当的势力。缅甸难说一点，不过也有可能。连泰国也不会是一个小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也许还是小国，虽然菲律宾人数很多，但是国家很穷，可能还要长久地依靠美国，这是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情况。

（二）统一的东盟

总之，这十个国家，现在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东南亚十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契约感，基于这个新的契约感他们建立了东盟组织，这个组织建立的背景很有趣。本来是出于共同反共的目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五国发起建立了东盟，当时这五个国家都是倾向反共的。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冷战之后东盟发展为十个国家，吸纳了像越南、老挝这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新加入的柬埔寨也有共产党的背景，缅甸虽然是反共的国家，但是也有很多独立的观点。这几个国家无论从历史背景，现实政治都不相同，但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国家组织——东盟，成立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契约，一方面考虑怎么对付中国，一方面考虑怎么对付美国，也对付印度。他们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在这个复杂全球化的经济里，某一个国家无法独立生存，非得一统，至少在某方面发出共同的声音，能够有话语权，才能够争取国际上的生存空间，这是他们组成契约的出发点。既然如此，这十个国家的领导人连同他们的政府官员们，费了不少精力，尽量想办法让这十个国家成为一个契约的政权。这样的话，在形成统一的局面之后，就可以应付各种各样的危险。

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样跟他们建立新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正是朱镕基总理提倡建立东盟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这个政策非常有效，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个政策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因此他们用反攻的方法来限制中国和东盟的特别关系，不停地在周边活跃着。因此现在的形势就变得更复杂了，中国与东盟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坦白地说，南中国海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本身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有主权问题的争论，因此可以有这个借口，可以用这个方法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进而趁机来影响到将来的发展。而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也不是非要亲美，或者亲中。其实他们基本的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独立、统一的东盟，如果他们能够统一，能够有同样的对外政策，能够共同面对临近的所有势力保持东南亚地区的独立与稳定。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也不能不跟着他们活跃。因为新加坡的国家利益跟他们一样，如果靠东盟统一发展，新加坡还可以生存发展，不然的话，太小的国家，也没办法独立地生存发展。总之，东盟的将来对中国非常重要。从中国的观点来看，统一的东盟不是个坏事，是好事。朱镕基总理曾经讲过，中国的利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东盟，东盟国家自己也认为要统一。我认为这是对的。我不敢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同样的政策，但是总的趋势，大家都认为：将来的世界，随着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将会使整个世界的发展东移到亚洲地区来，东盟应该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主要的理由就是它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洋之间，在陆地上也是占据重要的关键位置：中国、日本之南，澳大利亚、美国之西，随着将来印度的发展，在这几个外围国家的发展情况下，东盟站在中间，分享到的好处应该是很多的。

大家都一致认为，统一的东盟是件好事，对大家都有益，那为什么还有问题呢？所有的国家都尽量想办法，能够维持东盟统一。但是存在不同的势力，会有一些人认为，要让东盟统一就要让它倾向哪一方面。在现实中，东盟的国家是不愿意“亲”哪一方面的。据我了解的所有东盟国家都希望东盟应该是完全独立的，站在中间，跟周围的大家一样的要好，得到最大的益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统一很难。本来大家是有很大希望的说东盟统一一定会成功，但现在看起来不简单，就是因为南中国海的问题。这就是说，怎么样处理南中国海的问题，会影响到将来东盟的前途。俗话说，小事情纠纷多，出现纠纷很容易。但是我觉得要解决起来也不太难，要尽量地避免在南中国海有任何的冲突、任何的纠纷。尽量避免的话，就在无形中让东盟有时间解决它内部的矛盾，让东盟可以成为一个比较统一、独立的势力。如果不解决问题，让人家挑唆，使得南中国海不停地不安静，就很容易分裂，让东盟自己从内部分裂。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东盟现在里面就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菲律宾就太靠近美国，很多东盟国家不同意它的政策，菲律宾也知道其他国家不同意它；泰国也依靠美国，而越南却不敢依靠美国，因为它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至少传统上保持非常友好。中越关系非常微妙，特别重要，也很特殊，这是因为中越关系里面同时包含着一组矛盾，一方面中越有很特殊的关系，几千年的历史往来。另一方面越南要成为东盟的成员，东盟成员国家都希望它不要跟中国有过于特殊的关系，这里面就出现了问题。像缅甸本来也是跟中国很要好，而且相当独立。但是现在各种势力又想借缅甸干涉东南亚的国家关系，这里的问题已经引起东南亚地区的关心与注意。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所有东南亚的领导，他们都同意一点，东盟将来是要统一的，无论如何东盟的前途是靠一统。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够形成一种共同的对外政策，这样的东盟才有益于亚洲将来的发展，统一的东盟才是最有希望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现场提问一：对比历史上印度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在东南亚生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孔子学院在那里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请您谈一下对此问题的看法。

现场提问二：请您从历史与文化角度，进一步解释“上海症候”与“广州症候”的说法？

现场提问三：您觉得就中国崛起而言，在文化方面中华民族应该如何实现复兴？

王赓武教授：

综合以上的提问，我觉得自己应该从文化问题的角度来回应较好。关于文化的问题，我想这可能跟中国本身的儒家思想有关，从最早的材料上看，儒家思想都不赞成打出去，都是考虑自己的文化，怎么样能够发挥、怎么发展，主要在国内能够维护秩序是基本的理念，没有传教意识。理由很多，大概是因为儒家的思想是来源于农业经济的基础，最适合乡村的生活。也就是强调从“家”的概念出发，“齐家”是最重要的，“齐家”之后才可以“治国平天下”，出发点是来自“修身齐家”，对于“家”的概念太重视了，限制住自己的活动范围；重视家的发展、生存、富有，因此对外界的探索受到了限制。每一个家族之间的关系都特别重要，外界的其他关系不怎么重视。

外来的影响有一点特殊，其中有传教的因素，比如基督教就特别重视传教。但是其实伊斯兰教并不重视传教，它也是由于个别商人的经历，把他们自己信仰的宗教带到别的地方去，就影响了当地的人，但是不重视传教。总之他们的概念没有受家的限制，他们的教义什么人都可以去信，你只要入教，就成为教会的成员，全部的精力从自己的国家民族移到宗教信仰上去了。这样比较来看，这些宗教可以很容易脱离本土的概念，而去信仰一个普遍的新的思想、新的意识形态。印度教也是不传教的。曾经有人说，佛教多少有一点传教的精神，但是不像基督教那么重视。它的

传教精神是，跟从它的道理，把教义讲清楚。因为印度佛教在其他地方流行开的理由，是因为有人出去，跟人家去解说佛到底讲的是什么。这样看，佛教有一点传教的精神，但是不像西方那样有系统、有政治背景的传教。佛教传教没有政治背景，纯粹是内部自身的发展，把它信教的道理，给人家知道，使得别人也清楚了解他们的意思。

印度教到东南亚是不是传教来的呢？我们不知道，没有记录。我所知道的就是，许多当地土著的国王，很快接受了这些印度教的概念，建立他们王国的制度。换句话说，东南亚各地建国的过程中，利用了一些印度王国的佛教概念，这些概念被带到东南亚去，当地才成为国家。在这之前，他们没有国家概念，都是各个民族在各地的发展。因此我们说在东南亚，“国”的概念来自印度教和佛教。之后怎么会信伊斯兰教呢？也是非常奥妙的过程。基本上是因为一些国王，听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讲自己的宗教。这些人经商很成功，很富有，而且很愿意帮助这些国王经商，说他们成功的理由跟宗教有关系。伊斯兰教的商人影响力很大，渐渐地说服了这些东南亚的国王，这些国王都被劝说接受了伊斯兰教。国王接受之后，他的臣民很忠诚地跟随，也信了伊斯兰教。经过几十年的工夫，好几个王国都信伊斯兰教了，后来的两三百年来，整个马来群岛都信奉了伊斯兰教。这么快的转变很难理解，但大家都相信这一变化来得很快。

儒家思想则不一样，与另外一点也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儒家成为了中国国家的领导思想，几乎是各个朝代意识形态的中心。也就是说儒家思想跟中国国家政体有太密切的关系，使得这个儒家的思想教义本身没有了一个本性，本性已经属于国家了，跟中国的政体、跟朝廷有直接的关系。其他的国家看来，既然没有需要，就不会对这个感兴趣；儒家也不会传到外面去。正是儒家依靠自己国家的政体，一方面使得儒家很成功，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被管制得相当好。但是同时儒家的思想，受到了束缚，变成国家的一套东西，要传到别的地方不容易，只能要依靠国家去传播。

举例来说，越南能够跟儒家有密切关系是因为历史上它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千年的关系，使得越南到现在为止，还有相当深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朝鲜和韩国也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是自愿的，因为非常仰慕中国的文化，派了许多国家精英的人才，到中国来学习。学成之后，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也采取了儒家的思想，当作他们国家的领导思想。日本的话，根本就没有完全接受儒家思想。日本最初是非常仰慕唐朝帝国的，他们也学习中国。但是唐朝的时候儒家地位还没有那么高，还有佛教、道教。最早日本建立国家的过程，基本上理念不是以儒家为主，是以佛教为主的，儒家只是一部分而已。一直到17世纪德川政权建立时，日本才正式利用儒家思想当作国家的主导思想。因为之前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为主，因此到现在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还是比较浅的。

儒家思想和中国政权的密切关系，可能是由于儒家不能像其他宗教那样到处去传播造成的一个影响。因此儒家就没有一个独立思想的自由，并不是真正能够用思想去说服人家的。结果就是人家就难以接受，中国也不去传教。中国只能正统地把东西拿出去，才算是向别人传播影响；儒家本身没有独立的教义来说服人家。因此要信儒家的话，就要跟中国走，但这样又会变得跟中国关系太过于密切。一个“家”观念的基础，加上国家跟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太过紧密，反而使得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受到限制。中国的乡土概念非常深，我认为到现在还是如此。

关于广州与上海的文化症候，上海是开港的第一港，外来的势力影响是最大的，外来势力进入中国，就是从上海进来的。其实与外国联系最初是广州带头的，广州跟外国开始联系最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从汉朝的南越国之后，所有中国跟海外的关系，大部分要经过广州。广州对于中国对外发挥影响有很大关系。但是广州对于中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广州人自己并不接受这些外国的文化影响，反倒是广东人非常爱护中华文化，抵制外来文化。上海则不同，开港是在19世纪以后，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势力。不像早期的广州，所有外来的商人只是少数。广州可能受到一点外来影响唯一的一段时期，就是受到佛教影响比较大的那个时期。我们知道南方的佛教是来自

于广州的，北方的佛教是长安丝绸之路带过来的。南方的佛教，跟北方佛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有南方海路传来的佛教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太大，后来佛教也基本上汉化了。

从伊斯兰世界到东南亚的商人也是要去到中国的，穆罕默德的《可兰经》里说，要到中国去学习。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他们贸易的重点也是广州一带。阿拉伯世界的史料里说，黄巢之乱波及广州的时候，广州被杀的阿拉伯人就有几万人。我第一次到广州去的时候去参观过一个清真寺。寺庙里的人自己认为这座清真寺有着非常古老的一段历史，他们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我不敢接受。他们说这是穆罕默德的叔父把伊斯兰教带到广州的。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那么广州从7世纪起就有伊斯兰教的教堂了。这个我不信，但是总之广州的伊斯兰教的确有很悠久的历史，即使不是7世纪，8世纪、9世纪的广州当然也有伊斯兰教了，这应该是属实的。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广东人基本上不接受伊斯兰教。后来葡萄牙占领了澳门，使得这里成为一个天主教传教的地方。早期一些来华的耶稣教徒，都是经过澳门进到中国去的。但是广州人中间信仰天主教的人很少。中国到现在为止最有名的天主教徒还是上海的徐光启吧。

这种差异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本身内部就有很大的不同，上海人、广州人、东北人、北方人都不相同，各有各的区域之别，但是你们现在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其实在地方上还是有着很多特殊之处，是值得注意的。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开放的原则就是以上海为基本模式的。当然也受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影响，但这些影响跟上海的模式差不多。其实香港以前就是一个小上海，香港不是因为大陆的历史变化的话，也会不像今天的香港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大港。正是因为1949年上海关掉了，让所有最活跃上海人都跑到香港去了。香港的经济从1949年才真正发展的，香港成为了第二个上海。前几个月我到重庆去的时候，重庆说在嘉陵江北部，要进行一个很大的发展计划。一开口就说，这是学的浦东，就是上海模式。但是我到西安去的时候，感觉到当地的乡土文化非常强烈，人们的观念基本上是很保守的。原有中国的许多观念，还在那里得到体现。

这些经历都使得我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开放的模式，是一个模式吗？但是中国原有的乡土模式，好像并没有被废弃掉，仍旧非常的坚强保留着。这两个势力相当平衡，不能够忽略一个或者另一个。一方面是代表改革开放的上海模式，重庆现在学的浦东，其他大城市受上海模式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在全国任何一处地方，也能够感觉到乡土观念依旧非常强。面对这两者，不是对立的问题，而是平衡的问题。对于这两方面，中国都需要：一方面代表一种进步的、向外面学习的力量，尤其在科技、技术、经济方面；一方面对于自己的文化，可能在乡土文化里才能够很好地保存。如果没有这一点认识，中国的前途就更不清楚了。如果平衡的话，两方面都会好，一方面保留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同时又能够吸收接受新的概念，这样才能够使得整个社会进步发展。

我的回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342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